

1920 年代臺灣的書房教育： 以鄭家珍《客中日誌》為觀察中心*

詹雅能**

摘 要

鄭家珍舉人原籍臺灣新竹，乙未割臺後回歸祖籍地福建南安，以教職為業，1913 年因堪輿盛名受邀返臺，為鄭如蘭勘定葬地；1919 年起更膺新竹北門鄭家之聘擔任西席，此後寓臺共計八載。大抵，鄭氏在臺期間，主要職務為書房教師，對於新竹地區的漢學傳承有其影響力。而寓居新竹從事漢文書房教育時，鄭家珍恰好身處 1920 年代臺灣教育重大轉折階段，隨著新教育令頒布和相關政策的規範，一方面新式公學校數量逐漸增加，但另一方面校內漢文授課時數卻大幅減少，民間書房被迫受檢，甚或遭遇取締，導致漢文教育發生危機，則此時書房教師角色為何？書房教育何以進行？對此，筆者因緣際會整理、出版鄭家珍在臺《客中日誌》8 本，所記時間從 1923 年 9 月 23 日至 1926 年 8 月 18 日止，其內容具有歷史、文學、堪輿、教育等面向意義；在此，筆者特別留意日記中存錄這位清代舉人，返回臺灣新竹開設書房教書的諸多情景，例如上課時段、學生人數、教學課程與內容、學生出席情形、學費收入、書房申請，以及書房教學和傳統詩社關係等。上述細節，無疑可以提供吾人觀察 1920 年代臺灣面臨新式教育推行、挑戰下，傳統書房教育的運作狀態，以及鄭氏身為教師對於傳統漢文書房教育的規畫與期待，可謂理解相關議題的極佳入徑，故本文特就此進行分析。

關鍵詞：鄭家珍、《客中日誌》、書房教育、新竹、詩社、漢學講習會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MOST 104-2410-H-236-001-）相關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主辦之「第七屆日記研討會：日記中的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經增補修改後投稿，承原會議論文與談人施懿琳教授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而撰稿期間，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林祈佑、魏亦均等之協助資料蒐集，新竹鄭淑精女史、鄭昞輝先生提供文獻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來稿日期：2019 年 6 月 26 日；通過刊登：2019 年 8 月 30 日。

- 一、前言
 - 二、鄭家珍與《客中日誌》
 - 三、鄭家珍書房的設置與申請
 - 四、書房學生及其收費情形
 - 五、上課時間、課程安排及相關教學情形
 - 六、結論
-

一、前言

書房教育在臺灣，從清代開始就屬於學童初等啟蒙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是士子在進入官學系統，參與科舉考試前的預備教育。不過，這樣的特色與需求，到了1895年（光緒21年）臺灣割讓日本後有了變化。主要關鍵是臺灣原有的官學系統全部廢絕，殖民政府為了統治需要，從初期設置的國語傳習所，到後來改制為公學校，希望藉由日本的新式教育逐步同化殖民地人民。然而受制於種種條件的限制，公學校實際難以普及，1933年（昭和8年）的學童就學率只有37.02%，而要到1939年（昭和14年）才超過50%。¹ 前期主要因素在於臺灣人的就讀意願不高，後期則因學校數量不足，無法完全容納願意就學者。² 於是，在這些因素的考量下，殖民政府不得不採取漸進的誘導策略，以時間換取空間，暫時接受書房作為輔助教育之一環，並將其納入管理。因此，自1898年（明治31年）總督府接續頒布「臺灣公學校令」（7月28日）、「書房義塾相關規程」（11月10日），³

¹ 根據「年度別公學校一覽表」統計，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頁187。又1939年就學率為53.15%，詳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事情》（臺北：該府，1940），頁182-183。

²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頁17。

³ 按總督府先於1898年1月15日擬定「書房義塾相關規程草案」（條文7條），其目的在促成書房、義塾之改良，尤其是在課程與教材上，除依先前慣例外，更期許能增設「國語」教學科目，並使用總

表一 公學校與書房變化比較表（以重要轉折年度為觀察點）

年度	書房數	學生數	公學校數	學生數	全臺學生總數	備註
1898	1,707	39,941	76	6,636	46,577	「書房義塾相關規程」頒布
1901	1,554	28,064	121	16,315	44,379	「書房義塾相關規程」修訂
1903	1,365	25,710	146	21,406	47,116	「書房義塾相關規程施行細則」（新竹、桃園）
1919	302	10,936	438	125,135	136,071	「臺灣教育令」頒布
1922	94	3,664	592	195,783	199,447	新「臺灣教育令」頒布 「私立學校規則」頒布
1923	122	5,283	715	209,946	215,229	
1930	164	5,968	758	248,693	254,661	
1937	62	1,407	788	445,396	446,803	中日戰爭
1940	17	996	825	621,450	662,446	皇民化運動

資料來源：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臺北）16:3（1978年9月），頁62-89；《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

乃至 1899 年（明治 32 年）「學事視察規程」（7 月 9 日）的頒布實施起，⁴ 臺灣公學校與書房的發展，便形成一個競逐的局面，其變化情形如表一所示。

不過，由於「書房義塾相關規程」的規定，基本上只是一個行政規則，重點是在要求提出申報，至於規程中原期待應配合加設學科（國語、算術）與調整教材部分，僅訂有相關之補助條文，並無任何罰則；因此，儘管臺人各地書房多數配合申報，但教學上大抵維持舊有型態與內容，並且由於此一規程缺乏強制效力，不配合申報的情形也所在多有。⁵ 尤其在 1901 年（明治 34 年）總督府修訂規程時，將書房之開辦、經營改為地方廳長職權，並由各廳訂定「施行細則」，如此一來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所訂細則往往寬鬆有別。以新竹廳與桃園廳來看，⁶ 桃

督府認可之教科書。而到了正式發布的規程（條文 9 條）中，則增加「算術」一科，並擬定了申報規定、監督單位與獎勵補助措施等。詳見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 441-443。

⁴ 1899 年頒布之「學事視察規程」共計 4 條，其中第一條為小學及公學校視察之要項，而第二條則為書房義塾視察之要項。依據此要項，新竹廳於 1903 年（明治 36 年）2 月 27 日另頒「書房義塾視察規程」共 9 條，詳定視察之細則。詳見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 23；又《新竹廳報》86（1903 年 3 月 6 日），頁 107。

⁵ 吳文星以 1918 年之統計為例：宜蘭廳核可者 6 所，私設者 40 餘所；新竹皆無一所許可者；臺中廳彰化公學校學區許可者 21 所，私設者 22 所；嘉義公學校學區內許可者 1 所，私設者 10 所。詳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 70-71。

⁶ 新竹廳「書房義塾所關規程施行細則」（新竹廳令第 5 號）為 1903 年 2 月 12 日頒布。桃園廳「書房義塾規程細則」（桃仔園廳令第 3 號）為 1903 年 4 月 21 日頒布。此外，嘉義廳為最晚頒布。

園廳「細則」中各項申請、變更等事項均載明需「稟明廳長允許」，而新竹廳不論申請、報告等文書均經由街庄長、公學校校長呈送，督導視察亦委由街庄長、公學校校長直接負責，⁷ 這樣的申報與管理也容易流於形式。以本文所關注的新竹地區書房來看，日人統治初期的調查統計，1898年新竹縣書房有280所，而1903年（明治36年）「書房義塾相關規程施行細則」公告後，同年6月廳長里見義正公告廳內核准成立的書房共有161所。⁸ 這數字上的差距，除了轄區範圍不同的因素外，或許也有部分是沒有配合申請而未被納入計算者。因此，歷來統計日治時期臺灣書房變化消長之數量時，基本上都是就「書房義塾相關規程」及其「施行細則」規範下提出申請獲准者言。而隨著公學校不斷增加，書房亦漸次遞減，若以約當現今新竹市區範圍來看，前述1903年公告之161所中，其一區至六區（即今新竹市區）共有50所。相隔20年後，到了1923年（大正12年），新竹郡（包括今新竹縣市）內核准之書房有13所，屬於新竹市範圍的有8所，數量僅餘16%。⁹ 這現象說明了進入1920年代後，臺灣人在面對殖民教育的逐步滲透下，漢文教育已出現極大的衰頹危機。

然而，漢文教育的危機，不僅是書房數量的減少，同時也包括公學校漢文課縮減，甚至廢止其必修的規定。1898年「臺灣公學校規則」頒布時，「漢文」的教學內容原本是融入讀書、習字、作文等課程中，直到1903年修正「臺灣公學校規則」，始獨立為一科，每週上課5小時。而1907年（明治40年）再次修正「臺灣公學校規則」時，五、六年級的漢文課被減為4小時。1918年（大正7年），總督府「臺灣公學校規則中改正令」以涵養日本國民精神及培養具有生產力之人民為理由，將漢文科授課時數統一縮減為2小時。1922年（大正11年），在內地

⁷ 「書房義塾所關規程施行細則」第二條「書房義塾以所轄街庄長視察之，但在公學校設置區域內者以公學校長視察之。」第十一條「書房義塾之開設者應行呈出之願書屆書及報告書等均要經由所轄街庄長，若在公學校設置區域內者則經由公學校長可也。」詳見《新竹廳報》83（1903年2月14日），頁100。

⁸ 《新竹廳報》105（1903年6月25日），告示，頁168-173。

⁹ 〈認可書房〉：「新竹郡下。自本年五月十二日至六月末。認可漢文學書房十三處。即新竹南門外靜課軒書房。同南門漢文專修書房。東門六也書塾。北門學渠齊書房。西門養蒙書房。新竹街客雅育英書塾。同滴雅集益堂書房。同金山面養正堂書房。湖口庄文行書房。紅毛庄維新書房。大〔六〕家庄育英書房。關西庄馬武督沙灘文光書房。同庄赤柯山字赤坳坪大正書塾。」參見《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9日，第6版。其中新竹南門外靜課軒書房、南門漢文專修書房、東門六也書塾、北門學渠齊書房、西門養蒙書房和同屬新竹街的客雅育英書塾、滴雅集益堂書房、金山面養正堂書房等屬於新竹市區書房。另，新竹州編，《新竹州第四統計書》（新竹：該州，1924），頁90-91，亦有相同記載，唯書房名略有差異。

延長主義的政策下，總督府頒布〈新臺灣教育令〉（2月6日），實施日臺共學制度，接著發布「臺灣公立公學校規則」（4月1日），公學校課程大幅調整，其中漢文科被改為選修課（隨意科），並由學校自行決定是否廢除。這時期的發展，可謂是當時漢文存廢與否爭議最大的時候，儘管臺地有識之士不斷呼籲，但在總督府強勢政策主導下，整個制度的改變已不可逆轉，唯一可能的空間在於地方州廳政府執行的寬鬆與否。然而，對於臺人而言，雖然日本統治已經有二十多年，但對於漢文使用的需求，未曾稍減，因此在學校課程或工作「時間」外的漢文學習，便成為家長們鼓勵的學習活動，而經濟較為餘裕的地方家族，也往往聘請家庭教師教導其子弟，在新竹地區，吾人便留意到鄭家珍這一個案。

鄭家珍，原籍臺灣新竹，為甲午科舉人，乙未割臺後回歸祖籍地福建南安，以教職為業。1913年（大正2年），由於堪輿盛名受邀返臺，為鄭如蘭勘定葬地。因著此一因緣，1919年（大正8年）起他更接受新竹北門鄭拱辰之禮聘來臺擔任西席，教授漢學，此後寓臺八載。大抵，鄭氏在臺期間，對於新竹地區的漢學傳承有其影響，與葉文樞、張純甫被視為當時三位最具貢獻的漢文教師。¹⁰ 當鄭家珍在1919至1927年來臺從事漢文書房教育工作的數年間，恰好身處1920年代臺灣教育重大轉折階段，隨著新教育令頒布和相關政策的規範，新式公學校數量逐漸增加，但公學校漢文授課時數卻是大幅減少，民間書房被迫受檢，甚或遭遇取締，導致漢文教育發生危機，而此時書房教師角色如何？書房教育何以進行？諸多問題自是耐人玩味。對此，筆者整理、出版鄭家珍在臺後期所留《客中日誌》時，特別留意其中存錄了這位清代舉人，由中國福建返回臺灣新竹開設書房教書的諸多情景，例如上課時段、學生人數、教學課程與內容、學生出席情形、學費收入、書房申請，以及藉由書房教學而延伸出與傳統詩社的關係等。以上種種細節，無疑提供吾人觀察1920年代臺灣面臨新式教育推行、挑戰下，傳統書房教育的運作狀態，以及鄭家珍身為教師對於傳統漢文書房教育的規畫與期待，可謂理解相關議題的極佳入徑，因此本文以此為題進行探討。

¹⁰ 鄭家珍與葉文樞、張純甫三人，於日治時期不僅開設書房，教授傳統漢學，同時也指導學生成立詩社，學習漢詩寫作，在當時培養了不少新竹地區的年輕學子，深具影響性。另參見武麗芳，《日治時期壠城詩社淺探：耕吟社、讀我書吟社、柏社》（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0），自序。

二、鄭家珍與《客中日誌》

有關本文之研究，因以鄭家珍及其《客中日誌》為對象，故以下略就鄭氏個人生平與《客中日誌》內容加以簡介，尤其側重其教育面向的闡述，以利理解本文問題意識及後續論述之開展。

（一）鄭家珍生平及其教育事功

鄭家珍（1868-1928），出生於清代臺灣淡水廳竹塹城外東勢庄（今新竹市東勢街），先世原居泉州南安，嘉慶、道光年間祖父鄭賢濕舉家遷臺，定居塹城外隆恩圳旁東勢地區，以農墾為業，直到鄭家珍始以科舉功名顯揚。有關其生平，筆者因獲鄭氏在臺學生紫霞堂住持鄭却、養女鄭淑精（現今住持）及其南安家人所珍藏之史料、譜牒等，故得以進行詳細之考掘與探討，前已發表〈從新竹到南安：以新史料重探舉人鄭家珍生平事蹟〉一文，¹¹ 此不贅述，僅節略其生平如下：

鄭家珍，譜名彥奇，字伯璵，號雪汀，又號雪蕉居士，榜名家珍。竹塹城外東勢莊（今新竹市東勢街一帶）人。雖生長於農家，但勤敏向學，受業陳錫茲門下，塾中資質最優，視為國器。20歲（1887）時，設帳於東邨別墅。光緒14年（1888），考入新竹縣學，16年（1890）以科考一等第一名遞補為廩膳生。光緒20年（1894），考取甲午科第36名舉人。1895年乙未割臺後，舉家內渡，返回泉州南安故里，並於宗祠內設塾教授鄉里子弟，後更設館於泉州郡城泮宮內。光緒24年（1898），會試薦卷銓選州學正。30年（1904）起，擔任南安豐州學堂正教習。33年（1907），參加經濟特科考試，錄取福建省算術第一名，晉京參加會考，以二等籤分閩浙贛三省鹽運大使，因時局動盪而未能履任。光緒34年（1908），陞任豐州學堂堂長。隔年，獲委任南安縣視學員兼學務總董。民國2年（1913）起，擔任南安縣勸學所所長。民國5年（1916）至7年（1918），擔任崎峰鄉高

¹¹ 文收於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77-113。

等小學校長。民國 11 年（1922），負責籌辦本鄉[崎峰]「通德學校」並兼任校長。民國 2 年、3 年（1914）間，因精通堪輿之故，膺新竹北門外鄭家鄭擎甫之邀來臺，為其父親鄭如蘭勘看風水。民國 8 年（1919）春，鄭擎甫再次禮聘來臺擔任塾師，隔年（1920）2 月以思親辭歸，唯因家鄉動亂不已，遂於同年 4 月攜眷蒞臺，仍設館鄭家述穀堂；民國 11 年初返鄉省親，因父親年邁，而在鄉奉養，隔年（1923）2 月再度返回新竹，此後分別開設書房於北門外水田吳厝、鄭邦焯家等處。民國 14 年（1925 年）後半，改寓水田鄭同利家族紫霞堂授課，直到民國 16 年（1927）底返回泉州南安，隔年（1928）因病去世，前後寓居新竹共計八年。

就以上生平梗概，可以發現鄭家珍生長於新竹，以新竹縣籍身分考取生員，進而遞補廩生資格，接著在光緒甲午年考取舉人。然而，隔年乙未割臺，日人領臺後不久，鄭氏即舉家返回南安祖籍地，當時他 28 歲。¹² 回顧鄭氏家族自清代中葉遷臺起，歷經三代，到鄭家珍時再度舉家遷徙，返歸南安。此次遷徙，是再一次的身分轉換，當年祖父由南安入籍新竹，從事農墾以維生計，而今鄭家珍以舉人身分，歸籍南安，設帳教學，歷任學堂教習堂長等職，奠立了南安武榮鄭氏家族的社會地位。李輝良〈臺灣舉人·南安辦學〉一文記載，¹³ 鄭家珍家族早年全家移墾入籍臺灣新竹後，便與宗族缺少聯繫，歷經三代，在南安已無族親可以依傍，經泉州友人先行探查，獲得族長認可後，才踏上回鄉之路。據言當年族人甚至抬轎至泉州府城迎接，並為其安排住屋，在族人的熱情歡迎下，鄭家珍開始了返回祖籍地定居的生活。而得力於在臺所獲科舉功名，鄭家珍由宗祠內設塾教導族中子弟開始，再到泉州府文廟設帳授徒，一路當上了南安豐州學堂正教習、豐州學

¹² 根據《福建省南安縣溪美鎮崎峰村鄭氏家譜》載錄，跟隨鄭家珍移籍的有其祖母、父母、四位弟弟及妻蘇引、長子榮烈等，當時祖父賢潔已去世，葬於新竹十八尖山。又根據《客中日誌》記載有「甘妹」一人，偶稱「舍妹」，寓竹期間多有生活上之照應，可知鄭家珍乙未離臺時，甘妹應已婚嫁，遂留在新竹。此外，有關鄭家珍內渡原因，黃旺成主修之《臺灣省新竹縣志·卷末：志餘》（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76）頁 5 中曾言：「鄉試中式翌年，受據臺日軍之侮：等於佚役，清掃街路馬糞。因不勝其辱，忿而挈眷內渡。」此說法雖屬後人追述，但多少反映日人領臺初期仕紳階層的惶惶不安與內心的屈辱。

¹³ 李輝良，〈臺灣舉人·南安辦學〉，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南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安文史資料：第 23 輯》（南安：該委員會，2001），頁 127-131。

堂堂長、南安縣視學員兼學務總董、南安縣勸學所所長、¹⁴ 崎峰鄉高等小學校校長。這些資歷，讓他在 1919 年膺新竹北門鄭家之邀來臺擔任家庭教師，並歷任於新竹北門外幾個大家族，直到 1927 年（昭和 2 年）底回閩，前後客居八載。

透過上述觀察，鄭家珍一生在教育上的表現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一是 1895 年（28 歲）以前清朝統治時期的新竹階段，其二是 1895 至 1918 年跨越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福建南安階段（28 至 51 歲），其三則為 1919 至 1928 年日本統治時期的新竹階段（52 至 61 歲）。以下針對各階段相關表現進行概述，以求掌握鄭氏在教育方面的學養累積及其影響：

1. 清領新竹時期的學業養成

這第一階段，自其出生到乙未年臺灣割讓，對鄭家珍而言是人生的奠基期。從 1888 年（21 歲）參與科試，蒙新竹縣方祖蔭縣結前列第七名、臺北府雷其達府結榜首第一名、提督學政唐景崧取進新竹縣學第二名開始，接著在 1890 年（23 歲）歲試獲巡撫劉銘傳取錄一等第三名，1891 年（光緒 17 年，24 歲）科試蒙代辦學政唐景崧取錄一等第一名補廩，以至 1894 年（27 歲）考中甲午科第 36 名舉人，過程堪稱平順，除了可見他在爭取功名上的努力成果，也驗證在陳錫茲門下，以資質優異而備受肯定的事實。由於勤勉向學，20 歲時便於鄉里設帳教學，地點在東勢鄭希康宅，¹⁵ 這是他初試啼聲，為新竹的地方教育貢獻一己之力。當時學生日後較具名氣者有王石鵬（1877-1942）。

2. 福建南安時期的教育事功

第二階段，在他人生的 28 歲以後，舉家返回祖籍地南安，重新落地生根，這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時期，不管是家庭、事業或者功名的穩定發展，均是此後 23 年的努力所致。其中包括保送專科，以會試二等分發鹽運大使，以及在泉州府與南安縣所經歷的各種教育相關職務，逐漸發展出他的在地影響力。由於這階段，主要仍處於清朝統治時期，故而參與科舉仍是其依循的目標。鄭家珍透過考試累

¹⁴ 按清末推行新式教育，先在各府、廳、州、縣設立勸學所，由縣級開始，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機構。1905 年，直隸率先創設此一機構，後逐步推廣至全國，民國以後，學所制度幾經變更，最後改為教育局。鄭家珍此一職位除因他長期對南安縣教育上之貢獻外，部分因素也在於其學生王啟文於民國元年 11 月繼任縣知事的關係。

¹⁵ 黃旺成主修，《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七：教育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76），頁 32。

積資歷，讓原本僅以設帳教學維持家計，卻在內渡後 10 年獲聘為南安縣豐州學堂正教習，更陞任堂長，同時也擔任南安縣視學員兼學務總董。此一身分讓他在跨越民國之後，儘管政局混亂，依然能以其清代的功名榮銜，在地方教育上扮演一定的角色。又，探究這一階段，鄭家珍所以能有機會在地方上主持並推動教育事務，跟他對於新學的重視也有一定關聯。

清代末期，中國處於新舊交替階段，科舉制度到了必須變革的時期。鄭家珍面對此一變局，在泉州文廟設帳時，便以講求新學為主。1900 年（明治 33 年）《臺灣日日新報》一則〈精工算學〉訊息，即介紹鄭家珍精研西洋算學有成，於泉州文廟設帳教學時，特別留意講求新學。¹⁶ 此外，1903 年更有一則〈新學啟後〉消息，報導鄭氏在新學教育上的貢獻。¹⁷ 憑藉如此的表現與成果，1907 年（40 歲）他參加閩省保送專科考試，取錄算學第一名，晉京參加會考，《臺灣日日新報》也刊登了相關報導，記錄當時情形。¹⁸ 此前王松 1905 年（明治 38 年）11 月出版的《臺陽詩話》也介紹他在新學教育上之表現：「鄭伯璵孝廉（家珍），吾竹鉅子也。自少好讀近世譯本，精於術數之學。乙未，避地入閩，從學者眾，皆游洋而歸；譜弟箴盤亦出其門。在泉有年，造就良多，當道推其算術為八閩第一。有英儒某氏聞其名，欲往試之，互相運算，竟被所屈」，¹⁹ 可知鄭氏在新學、術數的造詣已遠播新竹，而其對於新學的喜好更是從小養成。

除教學工作外，對於地方教育事務之推動，鄭家珍也是不遺餘力。1906 年（光緒 32 年）3 月，擔任豐州學堂正教習，南安縣籌設中學堂，鄭家珍特別致函鄭鵬雲代聘英文教習。²⁰ 1908 年起，擔任豐州學堂（即中學堂）堂長，主持校務。1909 年（宣統元年），獲委任為南安縣視學員兼學務總董，推動地方教育事務。1913 年後，更擔任南安縣勸學所所長，肩負南安縣教育發展之重任。1916 年，則返回崎峰鄉擔任高等小學校校長。

¹⁶ 〈精工算學〉，《臺灣日日新報》，1900 年 9 月 30 日，第 5 版。

¹⁷ 〈新學啟後〉，《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¹⁸ 〈對岸通信 保送人員〉，《臺灣日日新報》，1907 年 3 月 2 日，第 4 版。

¹⁹ 王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陽詩話·上卷》（臺北：臺灣文獻叢刊第 34 種，該研究室，1959），頁 11。

²⁰ 〈廈門通信 南安縣將設中學堂〉，《臺灣日日新報》，1906 年 3 月 17 日，第 4 版。當時因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紳士議設中學堂，乃由鄭家珍致書囑時在廈門的鄭鵬雲延聘英文教習一員。

3. 殖民地新竹的漢文傳承

1919年起，鄭家珍踏入教育工作的第三階段，此一階段的遠因是1913年接受新竹北門鄭家邀約，返臺為鄭如蘭勘定墓地風水，這次機會讓他在乙未內渡後首次返回年輕時生長的家鄉，與昔日友朋故舊有了新的連結，也讓新竹人熟悉這位舉人返回南安後的發展。而近因則是，當中國進入民國時代以後，鄭家珍在南安面對的是一個動蕩不安的環境，除地方政府不穩定外，²¹ 從護國戰爭到護法運動，南安一直是處在南北政府軍對抗的折衝地帶。初期，他雖尚能維持豐州中學堂的教職，甚至擔任南安勸學所所長、崎峰鄉高等小學校校長，不過卻在1918年由於安溪、永春土匪往南蔓延，導致學校停辦，甚而攜眷播遷避難。因此，當1919年新竹鄭家力邀擔任西席時，便毅然東渡，開始其寓居新竹故鄉的教學生涯。

從1919年春到1927年年底返鄉歸省後止，除1922年留在南安外，前後8年時間，每年年初來臺，歲末歸省，往來於南安與新竹之間。這期間他先是在北門鄭擎甫（拱辰）家擔任家庭教師，直到1921年（大正10年）底返鄉探親止。1923年後則陸續於北門外水田吳厝、徵士第鄭邦焯宅邸、鄭同利紫霞堂等處開設書房。最後在1927年底返鄉歸省後，於1928年病逝南安，才結束其寓竹教學歲月。大抵，在新竹的八年間，鄭家珍基本上是以家庭教師身分在北門各家族間開設書房，教授其家族子弟，並旁及於周邊家庭之向學者。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日人列管的改良書房，鄭家珍維持著傳統書房的形式，主要授課內容以四書五經為主，又因學生多數為公學校畢業者，甚至有公學校教師，或已在職場工作者，故配合實用需求的尺牘課程也是教學的重點。此外，尚有少部分仍在公學校就讀之學生，則是利用學校「時間外」來書房加強漢文課程的學習，詳細情形另於下文敘述。但可知的是，在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政策性大幅刪減公學校漢文課程的時候，鄭家珍所維持的書房教學，對於漢文傳承具有一定之貢獻；尤其，他藉由書房教學，進而輔導學生成立詩社（耕心吟社），指導詩歌寫作，鼓舞、引領年輕學子投入當時臺灣詩社蓬勃發展的浪潮，裨益延續漢文於一線。

²¹ 民國成立後，各地政局混亂，民國元年南安縣知事一連換了三任，首任周守程3月中旬離任，接任者陳鴻光也於11月離任，其後由王啟文接任。往後至民國3年，南安縣知事一年內均接續更替三任。

（二）《客中日誌》及其書房教學紀錄

鄭家珍寓居新竹期間，留下不少詩文創作，門弟子彙集遺稿，編成《雪蕉山館詩集》，於1983年（民國72年）出版。今筆者因緣際會，藉由個案研究機會重新蒐羅遺稿，並從日治時期《臺灣日日新報》中彙輯不少序記誌銘等文類作品，遂而編輯出版《雪蕉山館詩文集》一冊。²²

除了參與各項文學活動留下的文學創作外，鄭家珍個人尚留存有《客中日誌》8本，記錄1923至1926年間的在臺生活情形。前三本使用的是市售道林紙小手冊（第一本為直行書寫，另兩本為橫行書寫），後五本則是使用毛邊紙對摺後以紙捻裝訂的自製小手冊（均為橫行書寫）。書寫工具採用的是毛筆，少數時日因在旅途中而使用了鉛筆。記錄時間始於1923年9月23日（陰曆癸亥年8月13日），結束於1926年8月18日（陰曆丙寅年7月11日）。其中，1923年9月23日至1925年12月31日（陰曆乙丑年11月16日），兩年三個多月間的記載完整接續，無一日缺漏；唯自1926年起，日記的記載開始出現斷續情事，有長至50天未記者。總計所記日數共有904天，若扣除1924年的86天、1925年的51天返回中國南安省親時所記部分，則其在臺灣所寫的日記共有767個日子。

而比較特別的是有關日記之「紀年」方式，儘管多數的寫作時空是在日人統治下的臺灣，然而日記原稿第一本的日期標示是「陰曆在前、陽曆在後」，尤其第一天更以「癸亥」干支紀年標示年份，而往後每天均有日干支之紀錄，到了第二本才改為「陽曆在前、陰曆在後」；直到第七本、第八本時，遂出現了在日記本上以油印方式套寫「民國〇年〇月〇日 陰曆〇年〇月〇日」的版型，以便利日期填寫。從第一本的傳統陰曆優先記錄方式，到後來改曆後出現民國紀年的標示，顯見鄭家珍日記記錄的時序思維基本上是屬於「民國」。

至於，日記的紀錄形式，第一本採取各日一段到底，連頁接續書寫方式，其餘各本則以每日一頁方式記載，並按「天時」、「人事」、「功課」、「書類」、「著述」、「財用」、「起居」、「附記」等事項分欄撰寫。此外，在一、二、

²² 收於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雪蕉山館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此作品集共分為5冊，分別是《雪蕉山館詩文集》、《客中日誌》、《客中日誌：手稿影存I》、《客中日誌：手稿影存II》、《鄭家珍詩文集》。

三、七本的後面附錄有「年度收入項札記」或「通訊錄」等。其中有關書房教學的情景，主要記錄在「功課」項中，「人事」項中亦偶會涉及與教學相關的人事紀錄。本文以下大抵根據這兩項資料中所記，來分析討論有關鄭家珍書房的設置與每日教學情形。

三、鄭家珍書房的設置與申請

如前所言，《客中日誌》中記錄了鄭家珍書房設置情事與每日教學情形，前者包括書房的開設地點、書房申請與官方視察，後者則包括開學（開館）活動、上課時間、學生人數、教學內容，以及學費繳交名單與收入狀況等，這些均有助於掌握並理解當時的教學現場及其相關細節。以下先就鄭家珍書房的設置與申請分述之。

（一）書房設置地點

有關鄭家珍於 1919 年返回新竹後，其開設書房的地點，歷來有幾個說法。最早為黃旺成《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他在「鄭家珍」²³ 傳中提及 1919 年返臺後，先是在鄭肇基家中擔任西賓（家庭教師），不久後辭退，改於寓所教讀。唯所謂「寓所」在何處？並未進一步交代。而第二位談到鄭家珍教學處所的是張德南，他在《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鄭家珍〉²⁴ 小傳中提到了鄭肇基家、水田吳氏耕心齋、東勢鄭希康寓所等三處，其中除了鄭肇基家外，還增加「水田吳氏耕心齋」一處，而「東勢鄭希康寓所」則似乎有為黃旺成說法做註的意味。至於，第三位黃美娥在其〈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博士論文中，²⁵ 除了承繼前人舊說外，更依據《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及訪問鄭却女史所得相關資訊彙整，²⁶ 共得鄭肇甫家、鄭秋涵宅、水田吳厝、北門徵士第鄭邦焯宅、

²³ 黃旺成纂，《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5），第七章〈教育〉類，頁 38。

²⁴ 張德南，〈鄭家珍〉，收於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1997），頁 95-96。

²⁵ 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頁 90-91。

²⁶ 黃美娥訪問、記錄，〈鄭却訪談紀錄〉（1996 年 2 月 24 日於新竹市寶山路紫霞堂）。

紫霞堂「寄齋」等五處。其中「鄭肇基」改作「鄭肇甫」，是根據《臺灣日日新報》，按鄭肇基乃鄭肇甫之子，故所指開課處實為同一地點。其餘四處，則來自於鄭却女史的田調訪問，而水田吳厝一處與張德南所記相同。

基於上述基礎，筆者根據今已出版的鄭家珍《客中日誌》重新考察，發現 1924 年（民國 13 年）6 月 21 日日記中有一則鄭氏個人的履歷記載：

郡署欲查民國二年後履歷，錄一紙與之：「二年，任南安勸學所長。三、四年續任。五、六、七年在本鄉任高小校長。八年二月渡臺，在鄭拱辰家任家庭教師。九、十兩年續任。十一年在本鄉襄辦校務。十二年二月渡臺，初寓鄭拱辰家，五月後移寓吳景祺家，任家庭教師。十三年續任」。²⁷

其中載錄他於 1913 至 1924 年間的相關教職履歷，尤其是 1919 年渡臺後，第一個設置書房地點是鄭拱辰家，時間從 1919 年 2 月（舊曆）至 1921 年，總計 3 年。至於，這段期間的書房情形如何？由於當時未有相關日記存留，亦無其它史料，致難以掌握。不過，既說是擔任家庭教師，則教授對象自當是以鄭家子弟為主。

同上履歷中提到，鄭家珍第二處書房的地點是在吳景祺家，時間從 1923 年 5 月至 1924 年。具體授課時間，根據《客中日誌》記載是 1923 年 6 月至 1925 年 1 月 11 日，合計兩學年。²⁸ 由於是擔任吳家家庭教師，因此學生以吳家子弟為主，據日記中繳交學費之名單，1923 年時吳姓子弟有吳景祺、吳俊楷、吳汝權、吳添旺、吳芝村、吳廷生等 6 位，1924 年部分則有吳俊楷、吳朝璇、吳冰銜、吳芝川、吳榮輝、吳景祺等 6 位。

除上述履歷記載外，在往後 1925 年的日記中，吾人可以重新拼湊出鄭家珍設置書房的另兩個處所。相關條目如下：

1. 民國 14 年 3 月 22 日（陰曆 2 月 28 日）：

²⁷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6），頁 96。〔按：以下引用日誌內容（含圖表）均不另列出版項及引用頁碼〕。

²⁸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陽曆一月十一日（陰曆十二月初六日）日記：「晚間夜讀生《中庸》已解完，計自五月開校，一部《四書》至此已卒業矣。」日記中所稱 5 月屬舊曆，依中西曆對照表是年 5 月份對照西曆為 6 月 2 日至 7 月 1 日，故以 6 月記之。另，民國 14 年陽曆一月十一日（陰曆十二月十七日）日記：「（人事）午前，諸生設筵為余餞別，並開詩會。午後六時，赴張鶴舫甲子會之宴。（功課）本日停課」。

(人事) 早飯後邦熙來訪談。頃之同往邦焯處看館地。薄午，戒三來取祭文，景祺亦來訪談。午後，同俊齋往看鳳區宅，擬租為住眷處。晚間，俊楷來坐談，余告以此舊曆三月初二日，將在邦焯處暫行開課。

2. 民國 14 年 3 月 25 日 (陰曆 3 月 2 日):

(人事) 午前到邦焯宅開課，入學者計有七人，夜間入學者二人。

3. 民國 14 年 5 月 28 日 (陰曆又 4 月 7 日)

(人事) 藥珠敦請余眷屬暫住紫霞堂，余感其雅意，於下午將敝眷移住其中，蒙其款接殷勤。

4. 民國 14 年 8 月 2 日 (陰曆 6 月 13 日):

(人事) 同居人有搬往別處者，余併其屋租之，以為書館，每月三元，磧地十元。

5. 民國 14 年 8 月 17 日 (陰曆 6 月 28 日):

(人事) 本日將書房移歸本寓，諸生照常上課。

在上列日記第 1、2 條記載中，我們找到第三處書房設置地點，是在北門外鄭邦焯宅邸，開課時間在 1925 年 3 月 25 日，至同年 8 月 17 日移往紫霞堂止，約近 5 個月。按鄭邦焯為鄭用鑑曾孫，²⁹ 若自 1923 至 1925 年日記中繳費學生名單來看，北門鄭家子弟陸續就讀的有鄭邦圻、鄭建樑、鄭建長、鄭邦熙、鄭應鰲、鄭邦清、鄭邦讓等 7 人，其中鄭邦圻、鄭建長、鄭邦熙、鄭應鰲等確認為鄭用鑑家族子弟。這將近半年的書房教學與黃美娥訪談所得紀錄是相符的。

繼鄭邦焯宅邸後，第四個、也是最後的設帳地點，是水田鄭同利家族的紫霞堂，依據上列第 3、4、5 條日記的記述總合觀之，可以看到鄭家珍由於眷屬來臺，

²⁹ 鄭邦焯，1893 年出生，1913 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為鄭用鑑孫安鏞長男，安鈞嗣男；安鏞父親為德均，德均乃鄭用鑑之三男。

受邀移寓於紫霞堂，時間是在 1925 年 5 月 28 日，³⁰ 唯書房授課地點仍維持於鄭邦焯處，直到 8 月 17 日才正式遷移至紫霞堂。³¹ 此後，持續於紫霞堂上課至 1927 年 12 月底返鄉止，共約兩年五個月。紫霞堂的家族子弟主要為鄭藝珠（即鄭却，受教期間為 1923-1927）。歸納上述，有關鄭家珍教學處所位置約如圖一所示。以上，依據《客中日誌》明確記載的教學處所共有四處：鄭拱辰家、吳景祺家、鄭邦焯宅邸及鄭同利宅，由於這是鄭家珍日記中的自我陳述，應屬於第一手的直接史料，故有關鄭家珍書房的設置地點，自當以此為準。至於，前行研究者曾涉及的「鄭秋涵處」和「東勢鄭希康寓所」等，基本上不在其列。³²



圖一
鄭家珍教學處所
位置圖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底圖引用 Google 地圖）

³⁰ 有關家眷來臺及寓居紫霞堂情形，詳見《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5 月 27 日、28 日、29 日之記載。

³¹ 按《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9 月 2 日載其所作〈紫霞書室〉藏頭詩云：「紫豔初開菊一籬，霞杯獨酌晚傳時。書生家計無他物，室有圖書案有詩。」可知鄭家珍將此時期書房命名為「紫霞書室」。

³² 有關「鄭秋涵」之說，乃黃美娥 1996 年 2 月 24 日訪問鄭却時所得資訊，唯比對王郭章訪問，〈鄭却訪問錄音〉（1991 年 6 月 30 日，新竹：新竹市文化局提供），另一說法為鄭秋涵處乃鄭却公學校 5 年級於課後所就讀之書房。又「東勢鄭希康寓所」，係源自黃旺成說法，唯其載此處所之標題為「清代竹塹城廂重要民學概覽」，記錄的是清代統治臺灣末期鄭家珍設置書房之處所，詳見黃旺成纂，《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七：教育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5），第二章〈教育機關〉類，頁 31-32。

然而問題是，鄭家珍寓竹八年期間，何以數度更換教學處所呢？探究其關鍵因素，乃在於鄭家珍是以華僑身分來臺教書，在新竹早無家屋，因此當其 1918 至 1921 年受邀擔任鄭拱辰家之家庭教師時，自然也寄寓在鄭家，並於述毅堂開館課徒。而 1923 年再度受邀返臺時，《客中日誌》如此記載：「十二年二月渡臺，初寓鄭拱辰家，五月後移寓吳景祺家，任家庭教師。」看來鄭家珍在 3 月（陰曆 2 月）渡臺後，仍然寓居鄭拱辰家中，顯然原本打算繼續在鄭家開館授徒。但不巧的是他在 4 月底至 6 月初間生了一場大病，³³ 拖延了開課日期，而接著 6 月 26 日鄭家大家長鄭拱辰過世，就在鄭家上下忙於籌辦喪葬事宜時，鄭家珍便移寓吳景祺家，擔任其家庭教師，並開館授徒。而在吳家擔任家庭教師兩年後，當 1925 年 2 月底由泉州準備返臺時，《客中日誌》提及：「午後清漣同稟中來寓，請示行止，余以臺地館地尚未定著，命稟中轉歸。」³⁴ 就「臺地館地尚未定著」來看，此次來臺似乎已不打算在吳家設帳。因此，當他 3 月 14 日一回到新竹，先是寄寓鄭肇基（伯端）家中，³⁵ 數日後便前往鄭邦焯家看場地，並決定在此暫行開館。³⁶ 唯若進一步追究此次更換教學處所的原因，大抵應與其家眷來臺有關，按前述返臺後尋找教學場地同時，鄭家珍也看好了「鳳區宅」一處打算作為眷屬來臺的居所，³⁷ 而當其妻王純一行六人於 5 月 27 日抵臺，隔天卻在鄭藻珠的盛情邀請下讓眷屬移住紫霞堂，其後也隨同入住。此後，直到 8 月初因紫霞堂同居人遷出而承租其住處為書館，8 月 17 日書館正式遷至紫霞堂寓所授課，成為鄭家珍在臺書房的第三次搬遷，也是最後一個教學處所。

（二）書房申請與官方視察

日治時期有關書房的開設，依「書房義塾相關規程」規定是由廳（州）長負責監督，且須報請核准後，方可開設。儘管如前言所述，此規定之執行，各地寬

³³ 有關鄭家珍生病一事，詳見其 1923 年 5 月 1 日（陰曆 3 月 16 日）至 6 月 4 日（陰曆 4 月 20 日）間詩作：〈癸亥三月十六日病中作〉、〈三月廿七日再請國川施治感賦〉、〈女弟子藻珠余表姪女聞日來視疾輒問今日安否余曰安乃喜為賦一絕〉、〈病中感懷 四月二十日〉。

³⁴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1925 年 2 月 27 日（陰曆 2 月 5 日），頁 199。

³⁵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1925 年 3 月 14 日（陰曆 2 月 20 日），頁 207。

³⁶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1925 年 3 月 22 日（陰曆 2 月 28 日），頁 211。

³⁷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1925 年 3 月 22 日（陰曆 2 月 28 日），頁 211。

嚴不一，致仍有未能遵行者。不過，畢竟此類書房以招收學齡童為主，與官方公學校有競爭關係，不依規定申請，恐有被取締之風險。至於，相較於這些招收學齡童為對象的書房，鄭家珍所開設的書房究竟是以何種形式存在？又其招收的是什麼樣的學生？而他又是如何被日本政府同意授課講學的呢？

根據前引1924年6月21日日記中所載個人履歷，從1919至1924年，不管是在鄭拱辰家或吳景祺家，他都是以「家庭教師」名義設帳教學。如果從當時日記中留存的學生名單來看，儘管有不少非家族子弟成員來就學，但大抵所收學生多屬公學校畢業生（詳後文）。他們利用平日或夜間來此一家塾就讀，基本上是屬於公學校畢業後的進修學習，對於日本政府而言，這似乎並未牴觸「書房義塾相關規程」的規定。然而，這種家庭教師形式的進修書房，是否就可以不須申請而自由講學呢？當然不是。在《客中日誌》中，可以看到1924年、1925年、1926年三次的申請紀錄，包括申請程序及核准前後的相關視察。

第一次申請紀錄是在1924年，相關日記內容如下：

1. 民國 13 年 5 月 12 日（陰曆 4 月 9 日）：

晴。照常上課。午後渡邊來視察，適余為蘇生木榮講《詩經》、《四書》，渠坐觀二刻許，始辭去。

2. 民國 13 年 5 月 31 日（陰曆 4 月 28 日）：

晴。照常上課。夜學會成立申請，郡守許可。

這一年的核准通過日期是5月31日，名義上為「夜學會」，至於何時提出申請？日記中並未載明，不過在核准前，新竹州知事官房會計課兼任屬員渡邊幸次郎³⁸於5月12日先來視察，應該是為了書房申請所做的審核確認。從日記行文語氣來看，可以感覺到這似乎並非第一次申請，去年應也辦過同樣手續，只是《客中日誌》1923年的記載起始日是在9月23日，故而之前的開學上課等情事，未能留下紀錄。

³⁸ 按渡邊幸次郎本職中壢郡役所庶務課屬員，新竹州知事官房會計課為其兼職。詳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三年》（臺北：臺灣總督府，1924），頁282、289。

不過，在對比於核准申請的5月31日，本年書房開課日是4月24日，³⁹ 可見書房在未申請核准前已先行開學。

第二次申請是1925年，相關紀錄有如下7則：

1. 民國 14 年 4 月 8 日（陰曆 3 月 16 日）：

（人事）託家寶章樣向州教育課抄去年學術講習會請認可原稿。晚間逢戴良先生來坐談，並託狀請認可之事，其中代為贊成。

2. 民國 14 年 4 月 9 日（陰曆 3 月 17 日）：

（人事）郡役所視學員詢問塾生事，余以係去年講習會會員告之，據云須請認可後，方可講習。

3. 民國 14 年 4 月 10 日（陰曆 3 月 18 日）：

（人事）因雨不出門，在寓無事。囑敦曜代寫〈漢學講習會請願書〉。

4. 民國 14 年 4 月 11 日（陰曆 3 月 19 日）

（人事）〈學術講習請願書〉既騰正，將請主催者用印，然後送郡役所。

5. 民國 14 年 4 月 13 日（陰曆 3 月 21 日）：

（人事）〈漢學研究會請認可書〉，今日已投郡。

6. 民國 14 年 5 月 1 日（陰曆 4 月 9 日）：

（人事）新竹州認可漢學講習會，指令八二一號下午送至，此指令係四月廿九日由州發，卅日郡經由。

³⁹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4 月 24 日（陰曆 3 月 21 日）載：「本早辰刻，安至聖先師位，釋奠，開學。諸生聯袂來入學者，有彭姓一人，吳姓五人、黃姓二人、李姓、孫姓、陳姓、邱姓、魏姓、張姓各一人，鄭姓二人，又女學生一人，蘇姓二人，計一十九人。晚間為諸生授課《詩經》、古文、唐詩」。

7. 民國 14 年 5 月 7 日（陰曆 4 月 15 日）：

（人事）午前九時，郡視學秋山來查訪學術研究會生徒人數及所讀何書？並囑以會之開始，須急行報告。

從上面第 5、6 則記載中，可知申請的「漢學講習會」⁴⁰ 認可書是在 5 月 1 日送到，而遞交認可書是在 4 月 13 日，州廳核可時間為 4 月 29 日，審核期間約 16 天。至於，整個提出申請的過程，在 1、3、4、5 則中，從 4 月 8 日託人到教育課抄錄去年申請認可書原稿，4 月 10 日請敦曜代寫〈漢學講習會請願書〉，再到 4 月 11 日騰正請願書後，請主催者用印，然後送郡役所，最後於 4 月 13 日正式遞件。從整個送件過程的描述，可以注意到有關漢學講習會的申請，需要有一位「主催者」用印，依日記行文的語意來看，並非鄭家珍本人，若以此年書房開設地點言，這位主催者極可能就是新竹在地的名望家鄭邦焯。⁴¹

而與去年相同的是，本次書房的核准時間也是在開始上課的一個多月後，依本年度開課日期 3 月 25 日來看，⁴² 不僅是核准日在後，連遞件申請的時間都在開課以後。這也無怪乎 4 月 8 日鄭家珍碰到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戴良來坐談時，⁴³ 要特別「託狀請認可之事，其中代為贊成」。尤其在前列第 2 則日記中，更可以看到隔天 4 月 9 日郡役所視學員來詢問塾生事時，特別提醒他：「須請認可後，方可講習」。而這位視學員秋山久七，⁴⁴ 在認可書核准後一週的 5 月 7 日再次視察書房，除查訪學生人數及所授課程外，更不忘再次提醒「會之開始，須急行報告」。

⁴⁰ 有關鄭家珍設置的書房，在日記中記載的名稱前後不一，有「夜學會」、「漢學講習會」、「漢學研究會」，所指實一。

⁴¹ 查，1928 年 3 月 29 日《臺灣日日新報》一則〈計畫漢文研究會〉（夕刊第 4 版）報導：「新竹北郭園主鄭神寶氏，此回與同志數名，擬聘鄭孝廉伯璦為講師，籌設漢文研究會，現已作成趣意書，向四處召集會員云。」此事由於當年鄭家珍病逝南安，未能返竹而作罷，唯大抵可佐證有關研究會或講習會的主催者即為地方之名望家。

⁴²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3 月 25 日（陰曆 3 月 2 日）日記載：「（人事）午前到邦焯宅開課，入學者計有七人，夜間入學者二人。」

⁴³ 戴良，1915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1925 至 1926 年間，任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並兼任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通譯。

⁴⁴ 按：秋山久七，1918 年任新竹廳三灣公學校教諭，1919-1920 年任銅鑼灣公學校教諭，1921-1923 年任大溪郡役所庶務課視學、竹南郡役所庶務課視學，1924-1927 年任新竹郡役所庶務課視學，1928 年升任新竹州內務部教育課視學。其後更任庄長、街長等職。詳見臺灣總督府所編各年份《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該府，1918-1924）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 14 年》，頁 276。

至於，接下來1926年的第三次申請情形如何呢？日記中相關記載如下：

1. 民國15年3月4日（陰曆1月20日）：

（人事）午前，黃其烈來訂明日看山之事。午後一時，與姪兒輩及藥珠姊妹等往廿張犁庄看打鞦韆，四時半回寓，藥珠亦同回。道遇戴良先生，託其請繼續漢學講習會時，為之招呼一切。

2. 民國15年3月7日（陰曆1月23日）：

（人事）今日漢學研究會開課。

3. 民國15年4月22日（陰曆3月11日）：

（人事）午前，妙清來訪談。夜至信齋處坐談，□張義榮聞渠請講習會認可僅有三箇月之限，據云係是近定新章。

本年度日記中，雖未看到有關申請及核可的明確時間，不過由於去年經驗，以及視學員的一再提醒，今年3月7日開課前的3月4日日記中有如下記載：「道遇戴良先生，託其請繼續漢學講習會時，為之招呼一切。」顯然開課前，鄭家珍在偶然機會下已先行向戴良口頭知會並請託了。不過，今年的核可期限卻有了改變，在4月22日認可書尚未送達前，鄭家珍經由張義榮得知有關講習會的認可，一次僅給三個月限期。

綜合以上分析，日記中記錄了1924、1925、1926三個年度有關書房的申請細節。其中1924年未記載申請日，核准日是5月31日（郡守核准時間）；1925年申請日為4月13日，至4月29日州廳發文核准，經由郡轉，而於5月1日送達認可書；1926年亦未記錄申請日，核准日則約在4月22日前後。以此觀之，1923年書房的開設按理應當也有完成相關手續，唯因當時尚無日記之記載。至於，先前於1919至1921年間以鄭拱辰家家庭教師身分設置的書房，是否曾向州廳申報，同樣也因缺乏資料佐證，無從考察。此外，若就已有的申請資料來看，鄭家珍設置的書房，基本上是以「夜學會」、「漢學講習會」（或稱「漢學研究會」）名義核准的。儘管，日記中個人履歷上自稱「家庭教師」，但在申請文件上仍須附上主權者用印的「請

願書」，顯然不同於「書房義塾相關規程」中所規範的書房，況且其招收對象是以公學校畢業後的學生為主，並非學齡階段的學童。因此，鄭家珍所設的書房，對總督府而言，並非與公學校相抗衡的私人書房，只要有地方人士為其提出申請，再加上能獲得如戴良這種對申請案擁有建議權者之背書，其取得認可核准應不困難。不過，隨著總督府漢文政策的調整，初期核准的期限以1年為期，但自1926年開始卻減為3個月，顯見殖民政府對於漢文教學的控管逐漸緊縮。再者，申請過程中郡役所於事前、事後派員視察，也在在說明官方對於這類書房設置的嚴格管制。

四、書房學生及其收費情形

如前所述，鄭家珍於 1919 年起以家庭教師身分在新竹北門外各家族間開設書房，教授家族子弟，並旁及於周邊家庭之向學者。尤其，他以「夜學會」及「漢學研究會」名義提出申請，這自然有別於日人列管的常規書房（招收學齡童），那麼其所收學生大抵是什麼背景？每年招收多少人？就學狀況如何呢？本節擬藉由一份學生的年度繳費名單來進行探究，並附及於其學費之收入情形。

（一）學生人數及背景分析

有關鄭家珍書房中學生的具體數量及名單，儘管未曾留下完整的名冊，不過根據日記中「年度收入項札記」的記載，可以整理出 1923 至 1925 年三個年度的束金（學費）繳交名單，⁴⁵ 有益於掌握其授課學生名單，茲列表二於下。

根據表二所列名單統計，1923 年繳交束金者有 27 人，1924 年有 23 人，1925 年有 16 人。此外，1926 年雖未載有繳交束金者名單，但該年 3 月 7 日「人事」項中卻記載：「今日漢學研究會開課，日學來入學者七人，夜學來入學者十六人，女學生五人，計廿八人」一則，可知當年入學學生有 28 人。

不過，這一份繳交學費之名單及人數與實際狀況似乎存有些許差距。其中，1923 年部分，因日記記錄時間較短，並無異常資料可以比對，故該年度學生人數依名單所載以 27 人計，當中包括「蘇維樑三人二十元」，以蘇維樑代表繳費，另

⁴⁵ 名單詳見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 120-121、212-213、389。

表二 《客中日誌》記載年度繳交學費學生名單

年度	繳交束金名單		
1923年 (民國12年， 癸亥年)	吳景祺八十元 吳添旺二十元 邱再傳三十元 林蔘珠三十元 鄭建樑三十元 黃其烈三十元 吳芝村二十元 蘇維樑三人二十元 吳廷生六元	吳俊楷四十元 高啟明二十元 鄭邦圻五十元 蘇其民二十元 鄭建長二十元 鄭邦熙二十元 陳章傳三十元 鄭應鰲六十元	吳汝權三十元 許光輝四十元 鄭金水三十二元 蘇木榮二十元 李增欽三十元 魏經魁二十元 張藩鎮二十元 李呈奇六元
1924年 (民國13年， 甲子年)	蘇奇民四十元 孫 牽三十二元 鄭建長四十元 黃其烈四十元 黃賜得二十四元 鄭蔘珠四十元 張藩鎮三十元 陳金木十二元	黃瀛槐四十元 鄭邦圻六十元 陳鎮圭二十元 李增欽四十元 陳章傳四十元 蘇木榮三十元 彭炳輝二十元 吳景祺六十元	吳俊楷六十元 吳朝璇二十元 吳冰銜三十元 魏經魁三十元 吳芝川三十元 邱再傳四十元 吳榮輝十六元
1925年 (民國14年， 乙丑年)	吳俊楷六十元 黃其烈四十元 黃上林三十元 黃賜得三十元 鄭邦清八元 鄭蔘珠四十元	許光輝五十元 陸鍾傳四十元 蘇木榮三十元 鄭建樑二十元 溫 吉十二元	鄭邦圻五十元 蘇其民四十元 吳朝璇三十元 陳嘉志十元 鄭邦讓三十元

二人未登載姓名。有關「蘇維樑」，在《客中日誌》出現三次，除「年底收入束金數」中作「蘇維樑」外，另兩次則作「蘇維梁」及「蘇維良」，⁴⁶「樑」、「梁」、「良」書寫各異，實為同一人。再者，張德南《新竹市志》〈人物志〉作「蘇惟梁」，並言「少年時代與其弟惟杰、堂弟惟焜一同就學於名儒張麟書，三兄弟均以成績優異，出類拔萃而聞名。」⁴⁷則其姓名正確書寫當為「蘇惟梁」，且據此可推知三人中之另二人應即為「弟蘇惟杰」與「堂弟蘇惟焜」。至於，有關本年度的日夜學學生人數，由於1924年1月12日日記中記載癸亥年夜學生有11人，⁴⁸依此推

⁴⁶ 《客中日誌》民國12年11月2日（陰曆9月24日）：「晴、風。上下午按時為諸生上課，晚間同。蘇維良辭，去東京。」又，《客中日誌》民國12年11月18日（陰曆10月11日）：「下午，接蘇維梁自東京市麴町區富士見町五丁目十六番地東濃館內來書一函。」

⁴⁷ 張德南，〈蘇惟梁〉，收於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頁271。

⁴⁸ 《客中日誌》民國13年1月12日（陰曆12月7日）載：「晚間，夜學一班十一人設宴為余餞別。」

算日學生人數應為 16 人。

又，1924 年繳交學費者有 23 人，然而該年 4 月 24 日開學日卻有如下記載：

本早辰刻，安至聖先師位，釋奠，開學。諸生聯袂來入學者，有彭姓一人，吳姓五人、黃姓二人、李姓、孫姓、陳姓、邱姓、魏姓、張姓各一人，鄭姓二人，又女學生一人，蘇姓二人，計一十九人。

顯然開學日報到的學生僅有 19 人。不過，往後日記中卻陸續記錄了新入學學生，包括 4 月 25 日邦圻（日學）、⁴⁹ 5 月 14 日黃賜得（夜學）、⁵⁰ 5 月 16 日陳金木（夜學）、⁵¹ 7 月 4 日吳旭之子、⁵² 9 月 1 日陳姓學生。⁵³ 以上相加後，合計為 24 位，相較於繳費人數則多 1 位，顯然其中有一位最後並未繳交學費，可能是中途輟學。再者，若將上述兩份名單與日記中年度繳交學費名單相互比對，其中新入學的「邦圻」應是「鄭邦圻」，與開學日所記「鄭姓二人」合計，鄭姓學生應有三人，但繳交學費名單中除鄭邦圻、鄭建長二人外，尚有鄭藁珠一人。只是開學日報到學生中，特別記載有「女學生一人」，通觀繳交學費名單中女性學生亦僅「鄭藁珠」一人，故而數列鄭姓學生數時自應不計及鄭藁珠，依此推論那位可能中途輟學而未繳交學費者應屬鄭姓學生之一。⁵⁴ 除此之外，日記中記錄前後入學者之姓氏／人數與繳交學費名單上人數則完全相符。⁵⁵ 綜言之，1924 年最後完成修業者確實即為繳交學費之 23 人，其中確認為夜學生者有黃賜得、陳金木二人，其餘待考。

⁴⁹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4 月 25 日（陰曆 3 月 22 日）：「早飯後邦圻來上學，合計共二十人。」〔按：「邦圻」即為「鄭邦圻」〕。

⁵⁰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5 月 14 日（陰曆 4 月 11 日）：「晚間，有黃姓名得賜者來上學，係增欽為之介紹。」按「得賜」一名，後文二處均作「賜得」，年度繳交學費名單中亦同，故當作「賜得」。

⁵¹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5 月 16 日（陰曆 4 月 13 日）：「晚間，有陳君金木來上學，年二十一歲。」

⁵²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7 月 4 日（陰曆 6 月 3 日）：「吳旭之子來入學」。

⁵³ 《客中日誌》民國 13 年 9 月 1 日（陰曆 8 月 3 日）：「晴。照例上課。有陳姓學生來上學」。

⁵⁴ 按此一輟學者，極有可能為去年曾在學的鄭建樑，其於隔年 4 月復學，見註釋 55。

⁵⁵ 其中開學日所載「彭姓一人」對應的是「彭炳輝」，「吳姓五人」加上新入學「吳旭之子」對應的是「吳俊楷」、「吳朝璇」、「吳冰銜」、「吳芝川」、「吳榮輝」、「吳景祺」，「黃姓二人」對應的是「黃賜得」以外的「黃瀛槐」、「黃其烈」、「李姓」對應的是「李增欽」，「孫姓」對應的是「孫牽」、「陳姓」加上新入學又一「陳姓學生」對應的是「陳金木」以外的「陳鎮圭」、「陳章傳」，「邱姓」對應的是「邱再傳」，「魏姓」對應的是「魏經魁」，「張姓」對應的是「張藩鎮」，「蘇姓二人」對應的是「蘇奇民」、「蘇木榮」。

至於 1925 年，繳交學費者有 16 人。同年 3 月 25 日日記中開課日對於報到學生的記載為「午前到邦焯宅開課，入學者計有七人。夜間入學者二人」，合計 9 人。其後陸續入學者有 4 月 1 日黃上林（日學）、始堂姪孫阿樑（夜學）；⁵⁶ 4 月 6 日邦圻（日學）；⁵⁷ 4 月 7 日其烈（夜學）；⁵⁸ 6 月 15 日邦亮；⁵⁹ 9 月 5 日溫吉（日學）；⁶⁰ 9 月 7 日蔡生；⁶¹ 9 月 14 日陳生（日學）；⁶² 10 月 13 日邦梓。⁶³ 比對現存繳費名單，除「邦圻」為「鄭邦圻」、⁶⁴ 「其烈」為「黃其烈」外，「始堂姪孫阿樑」應是指「鄭建樑」，「陳生」於繳費名單中可見為「陳嘉志」。至於「邦亮」、「邦梓」依字行論，應為北門外鄭家子弟，唯不見於繳交學費名單中，而 9 月 7 日入學的「蔡生」，最後也未見於名單中，更無從查考其名字，此三位或亦可能未完成年度修業。以上總計開學日入學者 9 位，往後新入學者 9 位，合計 18 位，扣除 3 位未繳學費者，繳費名單中應有 1 位之入學狀況未被記錄。此外，有關日夜學生人數狀況，除開學日所載 2 位夜學生外，後續入學者又有鄭建樑、黃其烈兩位，共 4 位夜學生，而日學生確認者有 9 位，其餘則無法認定。

最後，有關 1926 年的學生人數狀況，由於當日日記失記甚多，僅載至 8 月 16 日，因此並無年底繳交學費之名單；不過，3 月 7 日開學日中卻記錄了入學學生有 28 位，其中夜學生有 16 人，日學生則為 12 人（男學生 7 人，女學生 5 人）。⁶⁵ 唯於 4 月 18 日又載有劉坪來入學（日學），⁶⁶ 則日學生人數增至 13 人，總人數為 29 位。比較值得關注的是，本年度女學生有 5 位，這相較於前幾年僅有鄭蔡

⁵⁶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4 月 1 日（陰曆 3 月 9 日）：「午前黃上林來入學，夜晤養齋兄於信齋處。始堂其姪孫阿樑來入學，係出己意，未嘗與其家人謀云。」

⁵⁷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4 月 6 日（陰曆 3 月 14 日）：「邦圻來上學。午赴邦樞之宴。」

⁵⁸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4 月 7 日（陰曆 3 月 15 日）：「其烈夜來上學。」

⁵⁹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6 月 15 日（陰曆又 4 月 25 日）：「據邦倬言邦亮要來入學。」

⁶⁰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9 月 5 日（陰曆 7 月 18 日）：「溫吉君本午來上學。」

⁶¹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9 月 7 日（陰曆 7 月 20 日）：「蔡生來上學。」

⁶²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9 月 14 日（陰曆 7 月 27 日）：「上午陳生來上學。」〔按：「陳生」對照繳費學生名單有「陳嘉志」一人〕。

⁶³ 《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10 月 13 日（陰曆 8 月 26 日）：「邦梓來上學。」

⁶⁴ 鄭邦圻，生於明治丁未 40 年陰曆十月初六日，鄭安鏞四男、鄭安鈞嗣男（用鑑三男鄭德均之五男）。

⁶⁵ 按《客中日誌》民國 15 年 3 月 7 日「人事」中記載：「今日漢學研究會開課，日學來入學者七人，夜學來入學者十六人，女學生五人，計廿八人」，以及 3 月 9 日（陰曆正月 25 日）記載本年度第一天上課情形：「（人事）諸生齊來上課。（功課）上午上課十二人。下午同。夜上課。」可知日學生有 12 人，而此日學生 12 人應是包含 3 月 7 日所載之女學生 5 人。

⁶⁶ 《客中日誌》民國 15 年 4 月 18 日（陰曆 3 月 7 日）：「（功課）照例停課，下午劉坪君來入學。」

表三 鄭家珍書房歷年學生人數表

年度	入學人數	曾就讀人數	年度繳學費人數	日學生人數	夜學生人數	備註
1923	--	--	27	16	11	女學生 1 人
1924	19	24	23	1+?	2+?	女學生 1 人 1 人未完成修業
1925	9	18	16	9+?	4+?	女學生 1 人 有 3 人未完成修業，1 人失記
1926	28	29	--	13	16	女學生 5 人

珠一位，有大幅成長，惜因未能留下名單，以致無從探究。根據以上統計，茲彙整鄭家珍書房歷年學生人數如表三。

其次，透過繳費學生名單，基本上已間接取得鄭家珍書房的授課學生名單，針對這份名單，筆者進一步藉由各種相關資料，彙整分析有關學生履歷，藉以掌握書房學生背景，茲表列附錄於文末。

根據文末附錄中所呈顯的資料，可以看到有關學生成員的幾個具體現象：

1. 以癸亥年（1923）、甲子年（1924）、乙丑年（1925）這三年繳交學費名單觀之，學生總數 43 位，有 6 位連續就讀三年，11 位就讀兩年，其餘 26 位僅就讀一年。

2. 學生就讀時年齡，依目前推算最高者 31 歲（鄭邦讓），最低者 10 歲（高啟明？）。

3. 學生相關學歷，依目前可查考者估算，公學校以上學歷畢業者有 30 人，佔 69.7% 以上。

4. 學生職業別方面，計有在私人企業上班，以及擔任公務員或教師等職者，其中較特別者為曾經或現職為公學校教師的邱再傳、鄭金水、蘇惟梁、孫牽、溫吉等。

5. 入學學生以北門外周邊家族子弟為主，其中水田吳景祺家族有吳景祺、吳俊楷、吳汝權、吳添旺、吳芝村、吳廷生、吳朝璇、吳冰銜、吳芝川、吳榮輝等 10 位。而北門外鄭家子弟有鄭邦圻、鄭建樑、鄭建長、鄭邦熙、鄭應鰲、⁶⁷ 鄭邦

⁶⁷ 「鄭應鰲」，原鄭家珍《客中日誌》誤作「鄭應鰲」。

清、鄭邦讓等7人，其中鄭邦圻、鄭建長、鄭邦熙、鄭應鰲確認為鄭用鑑家族後人。

此外，根據前述表三中所列三年確定繳費的學生人數來看，從1923年的27位，到1924年的23位，以至於1925年的16位，人數雖有下降情形，但1926年雖無最後交繳費用名單，如果依入學時的統計人數有28人來看，人數又超越了1923年。儘管如前言所述，1922年起頒布了「私立學校規則」，書房義塾必須納入此一規則管理，造成書房銳減，但這主要是針對招收學齡童的常規書房。至於，像鄭家珍這類進修性質的書房，儘管每年仍必須依規定申請，接受官方視察，但其招收學生似乎並未受到明顯衝擊。尤其，鄭家珍書房中所招收的學生，多屬於公學校畢業生，除了在私人企業上班或擔任公務員者外，更有5名公學校教師。何以這些在學校教授漢文課程的公學校教師，仍需要在課餘時間加強自己的漢學能力呢？這基本上印證了過去一般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書房之所以持續存在的原因，多半認為是為了彌補公學校漢文課之不足，以及為了子弟進入到實業界時需要漢文書信能力的事實，而更嚴重的是此一現象也多少反映在公學校教師的漢文素養上，遂致有自我加強的需求。

同時我們在回顧鄭家珍受聘來臺任教的歷程時，更可以發現他是在1919年3月膺新竹鄭家之聘來擔任家庭教師，而對應於前述總督府針對漢文課程的管制措施，1918年起公學校漢文課由4或5小時大幅縮減為兩個小時，這已嚴重影響了臺人在日常生活以及工作上之所需，尤其是新竹北門鄭家產業龐大，子弟在承繼產業經營與管理時所需的漢文能力自當高於一般人之需求，並且家族中自鄭用錫以下歷代多數擁有科舉功名並具備漢學傳承之根柢，因此與其說鄭家珍離鄉背井來臺設帳，是因為當時福建家鄉一帶土匪蔓延，⁶⁸ 必須出外營生，倒不如說是臺地人士（尤其是新竹鄭家）有感於漢學衰頹，遂極力邀請鄭舉人來竹，教導家族子弟。同樣地，1922年，原本返鄉省親的鄭家珍，因南安族人見其在外奔波，且父親年事已高，遂特別為他辦了一所鄉校，希望能留在南安教導自家子弟。⁶⁹ 然而，就在同年，臺灣總督府為了實施日臺共學的同化政策，將漢文科改成選修課，甚至允許學校自行廢除。於是，隔年鄭家珍在新竹地方人士的盛情邀請下再

⁶⁸ 詹雅能，〈鄭家珍先生年表〉，收於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雪蕉山館詩文集》，頁349。

⁶⁹ 詹雅能，〈鄭家珍先生年表〉，頁351。

度回到新竹設帳教學。如此看來，鄭家珍舉人兩次受邀來臺任教，對於新竹地方的漢文傳承顯然具有其特殊意義。

（二）學生繳費及教師收入

根據《客中日誌》保留的學生繳交束金名單，其另一重要意義是可藉此探討鄭家珍的書房學生繳交學費及其年度收入情形。

就學生的繳費情形來看，年繳學費最多者 80 元，最低者 6 元，但約略半數以上的學生是在 30 元以上。有關書房學費繳交的規定，鄭却女史曾一度表示當時學費繳交是「隨人的意思」、「我們有多一些給他」，⁷⁰ 也就是說學費繳交是看個人心意，願意的可以多交一些。如果從繳費金額與學生名單來看，繳多繳少往往是視個人家庭狀況或就學時間長短而有所差異，譬如有繳交教學費紀錄的這三年中之前兩年（1923 及 1924 年）是在水田吳景祺家設帳，因此吳景祺就讀的兩年期間都是繳交最多學費，分別為 80 元及 60 元，又同家族成員吳俊楷 1923 年也繳交了 40 元、1924 年 60 元、1925 年 60 元，而北門鄭家子弟中則以鄭邦圻繳費最多，分別是 1923 年 50 元、1924 年 60 元、1925 年 50 元。而繳費較少者也各有原因，如蘇惟梁於 1923 年 11 月 2 日時辭行前往東京，故而兄弟三人因短期就讀而共同繳交 20 元學費。此外，有較晚入學者如吳榮輝繳交 16 元（7 月 4 日入學）、陳金木繳交 12 元（5 月 16 日入學）、溫吉繳交 12 元（9 月 5 日入學）。依上所述推估，當時像鄭家珍舉人如此條件的書房教師行情，每位學生一年繳交的學費約當是在 20 至 30 元間。也因此，鄭却連三年繳交 30 元、40 元、40 元，相對於行情言，頗能符合其所謂「多一些給他」的事實。

相對來看，從這份學生繳交學費的數額，吾人可以進一步掌握鄭舉人的主要年度收入情形，茲先彙整其書房年度收入情形如表四。

表四 《客中日誌》中所載學費年度收入情形

年度	繳費人數	總收入（依個人繳交總加）	教師平均月收	學生年度繳費平均
1923 年	27 人	724 元	60.3 元	26.8 元
1924 年	23 人	794 元	66.2 元	34.5 元
1925 年	16 人	520 元	43.3 元	32.5 元

⁷⁰ 黃美娥訪問、記錄，〈鄭却訪談紀錄〉（1996 年 2 月 24 日於新竹市寶山路紫霞堂）。

表五 1923年新竹州新竹第一公學校臺灣人教師年度收入表

教師姓名	月俸額	年度收入(月薪*12月)
戴良	60元	720元
林呼爐	52元	624元
黃振繩	52元	624元
林水樹	50元	600元
李良輔	50元	600元
莊金火	50元	600元
黃林水	48元	576元
林金水	46元	552元
溫吉	44元	528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大正十二年》，頁279。

對於鄭家珍而言，學費是其在臺主要且穩定的收入來源。⁷¹ 然而，以這樣的學費收入，鄭家珍的年度所得是高還是低呢？由於各行各業的待遇有其不同的基準，本文選擇以同樣擔任教育工作的公學校教師與政府立案書房教師來做一比較。

有關公學校教師部分，我們首先以1923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新竹州新竹第一公學校的臺灣人教師來進行觀察。以下根據《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所載名單及月俸額如表五。

根據前述表四之統計，鄭家珍1923年的學費收入為724元，換算平均月薪為60.3元，這個收入與表五中新竹第一公學校臺灣人教師最高薪俸的戴良（月俸60元）相當，而相較於後來成為他學生的溫吉（44元）來得高。不過，由於比較基準點的差異，鄭家珍收入是來自學生繳交的費用，學生人數多寡將改變其收入，而戴良所領的是固定月薪，且每年都會調薪。以下另就戴良1923至1926年間的收入進一步比對兩人的收入變化。

表六 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戴良1923-1926年收入表

年度	月俸額	總收入(月薪*12月)
1923年	60元	720元
1924年	62元	744元
1925年	67元	804元
1926年	72元	864元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23-1926年）。

⁷¹ 除了教書收入外，鄭家珍尚有不少額外收入，包括為人相墳、題主，或代筆、撰稿之潤資等。詳見〈年度收入項札記〉，收於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119、212、388。

依表六所列，戴良於 1923 至 1925 年間的年薪，分別為 720 元、744 元、804 元，逐年提升；而鄭家珍則是 1923 年為 724 元，1924 年為 794 元，1925 年為 520 元，前兩年均比戴良為高，但 1925 年卻因學生數減少而收入大減為 520 元，收入反較 1923 年時其學生溫吉的 528 元為少。顯然鄭家珍必須維持穩定的學生人數，收入也才能維持一定的水平，譬如 1926 年日記中雖無學費繳交紀錄，但在那年農曆春節正月初四（陽曆 2 月 16 日）學生許光輝、吳俊楷來訪談時，提及招募學生之事，並言「現日、夜學計有十餘人，束修約五百金之譜」，⁷² 而到了 3 月 7 日正式開學時入學學生已有 28 位，比 1923 年多 1 位，若無變動，則是年學費收入應當會超過 724 元，儘管相較於戴良同一年調薪後的 864 元（月俸額 72 元）年收入，仍有其差距，但至少相對平穩。

不過，鄭家珍的收入若與同樣以學生學費為收入來源的立案書房來比較，則可以看到較為明顯的差異。以下從 1923-1924 年《新竹州統計書》載錄的資料，⁷³ 可以看到當時新竹街書房設置的情景。相關資料彙整如表七、表八。

表七 1923 年度新竹街（今新竹市區）書房統計資料表

書房名稱（位置）	設立者	教師背景及人數	學生數 （男+女）	年度收入	學生年度 繳費平均
南門外靜課軒書房 南門漢文專修書房 東門六也書塾 北門學渠齊書房 西門養蒙書房 新竹街客雅育英書塾 滴雅集益堂書房 金山面養正堂書房	未載錄	師範學校 1 人 公學校 3 人 其他 8 人	346 (314+32)	1,682 元	4.86 元
總計（筆者統計）：		12 人	346 (314+32)	1,682 元	4.86 元

資料來源：新竹州編，《新竹州第三統計書》（新竹：該州，1923）；〈認可書房〉，《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9 月 9 日，第 6 版。

⁷²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 359。

⁷³ 同《新竹州統計書》中大正十年份、十一年份部分，有關新竹街上並未有核准設立之書房，故無統計資料。

表八 1924年度新竹街（今新竹市區）書房統計資料表

書房名稱（位置）	設立者	教師背景及人數	學生數（男+女）	年度收入	學生年度繳費平均
靜課軒書房（南門外）	李謙一	其他 1 人	28 (27+1)	240 元	8.57 元
養蒙書房（西門）	胡錦標	其他 3 人	40 (35+5)	200 元	5 元
漢文專修書房（南門）	張麟書	其他 1 人	25 (25+0)	130 元	5.2 元
養正堂書房（金山面）	高祖元	公學校 1 人	40 (35+5)	180 元	4.5 元
學渠齊書房（北門）	張壽	其他 2 人	54 (43+11)	256 元	4.74 元
六也書房（東門）	鄭得時	秀才／其他各 1 人	90 (80+10)	400 元	4.44 元
集益堂書房（滴雅）	鄭銳	其他 1 人	12 (12+0)	60 元	5 元
育英書房（客雅）	謝華英	師範學校 1 人	40 (35+5)	150 元	3.75 元
總計（筆者統計）：		12 人	329 (292+37)	1,616 元	4.91 元

資料來源：新竹州編，《新竹州第四統計書》；〈認可書房〉，《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9日，第6版。

以表七、表八所列兩年份的書房資料中，1923年《新竹州第三統計書》的資料並無書房名稱及設置地點，僅於「新竹街」項下標示有8所，茲根據前引《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9月9日〈認可書房〉報導有8處新認可書房，⁷⁴並填列書房名稱於表中。由於《臺灣日日新報》報導的書房名稱與1924年《新竹州第四統計書》所載錄的書房名稱一致，可知這八處書房在第二年仍持續核准辦理。此外，就相關統計數字來看，1923年的統計資料，只有8所書房合計之總數，並無個別書房的資訊；而1924年部分的統計，則已是各書房分開記錄。從統計數字來看，這兩年的變化不大，八所書房的教師均維持12人，學生總人數：1923年346人、1924年329人，學費總收入：1923年1,682元、1924年1,616元。依上述，學生平均每人年繳交學費為4.86元及4.91元，但若就1924年各書房學生學費之繳交平均來看，書房間存在著一定差異，最高者李謙一的靜課軒書房（南門外）平均學費為8.57元，最低者謝華英的育英書房（客雅）平均學費為3.75元，其餘則平均落在5元上下。⁷⁵

⁷⁴ 詳註釋9。

⁷⁵ 約略同一時期的臺南市書房學費繳交情形：1923年學生數360，學費收入2,566元，每人每年平均繳交8.44元；1924年學生數359，學費收入1,630元，每人每年平均繳交4.54元；1925年學生數229，學費收入1,592元，每人每年平均繳交6.95元。可見，臺灣日治時期立案書房之學費繳交，雖有一定行情，但似乎是由學生依個別家庭狀況自由繳交。故而，書房教師收入相對不穩定。詳見臺南市役所編，《臺南市統計書》（臺南：該市役所，1922-1925）。

根據上述繳交學費的平均數，相較於鄭家珍書房學生平均繳交 30 元上下的束脩金，可以看到這兩種學生的差異。有關上述政府立案書房招收的是學齡階段的兒童，以基礎的啟蒙教育為主，學生多半來自於一般家庭，在相較於公學校只有一至二元學費的競爭下，其收費標準很難提升，自然也影響到書房老師的收入。至於鄭家珍書房，由於所收學生多數為大家族子弟，且多半是公學校畢業生，甚有已經在職包括公學校教師者，因此其教學內容有別於一般書房的啟蒙教育課程，並且以其舉人身分的榮銜自然也是提高學生繳送束脩金的衡量基礎。

另外，從書房教師收入面來看，1924 年新竹街八處書房的年收入，以鄭得時六也書房的 400 元最高，張壽學渠齊書房的 256 元居次，唯兩個書房均是由兩名教師授課，因此若以單一教師的書房言，以李謙一靜課軒書房的 240 元為最高。然而，相較於 1924 年鄭家珍書房的收入為 794 元，不及其三分之一，可見鄭家珍的教書收入在當時算是相當豐厚。我們若以當時的米價來對照，1923 年一石米（一石約 120 斤）平均為 9.97 元，以鄭家珍 724 元的學費收入，可以買 72.62 石；1924 年米價波動，一石平均在 12.6 元，以當年學費收入 794 元，還可以買 63.01 石。⁷⁶ 只是這樣的收入，對他而言除了平常花費外，還必須經常匯款回南安老家支應家族開銷，故而在其教學授課之餘，鄭家珍還不時為人相墳、題主、代筆以增加額外收入，相關收支情形，《客中日誌》另有詳細記載。

五、上課時間、課程安排及相關教學情形

本文第二節中曾論及，鄭家珍之來臺教學對於「殖民地新竹的漢文傳承」有其一定之意義，而第四節中分析有關書房學生背景時，也認為鄭家珍書房的設置，在大正年間總督府大幅刪裁公學校漢文課程的時代氛圍下，尤能顯現臺人積極學習漢文的需求與用心。基於以上論點，本節將再就《客中日誌》中有關實際教學的面向來進一步討論，包括上課時間安排與課程內容規劃，以及於課堂教學外所延伸的詩社活動。相關內容載於日記「功課」與「人事」項中，透過這些資料的分析，可以具體掌握有關書房的實際教學情景。

⁷⁶ 何佳韻，〈日治時期臺灣北部地方米價的新探索：《新屋鄉葉氏嘗簿》的解讀與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0），頁 49。

(一) 上課時間安排

由於《客中日誌》基本上記錄了每天教學情形，包括上課時間、開課班級、學生出席，以及課程安排等，以下本小節先論其上課時間安排。

首先，有關書房的開課日（開學日），《客中日誌》1924至1926年的相關記載如下：

1. 民國13年1月11日（陰曆12月6日）：

晚間夜讀生《中庸》已解完，計自五月開校，一部《四書》至此已卒業矣。

2. 民國13年4月24日（陰曆3月21日）：

本早辰刻，安至聖先師位，釋奠，開學。諸生聯袂來入學者，有彭姓一人，吳姓五人、……，蘇姓二人，計一十九人。

3. 民國14年3月25日（陰曆3月2日）：

（人事）午前到邦焯宅開課，入學者計有七人，夜間入學者二人。

4. 民國15年3月7日（陰曆1月23日）：

（人事）今日漢學研究會開課，日學來入學者七人，夜學來入學者十六人，女學生五人，計廿八人。

其中，第一則所記1923年開課日是在陰曆5月（陽曆約6月），此日期係根據《客中日誌》1924年1月11日鄭氏於夜學生課程講授結束時的回憶性紀錄。而之後三則，所記1924年開學日是在4月24日，1925年在3月25日，1926年在3月7日，均屬即時性的紀錄。

有關書房的開學日，「書房義塾相關規程」中並無任何規定，根據清代以來臺灣傳統書房的開課日，通常是在舊曆正月十五以後開始，至12月中旬結束。不過，若根據上述日記紀錄來看，可以發現鄭家珍書房的開課日期是由其自行訂定的，原則是配合其由南安歸省返臺後的時間來安排。其中，1924年時由於2月

14 日父親過世，辦妥喪葬事宜後，又大病一場，以至於到 4 月 16 日才回到臺灣，故而開課日期延遲至 4 月 24 日（陰曆 3 月 21 日）。至於，1925 年鄭家珍由南安返臺時間是在 3 月 11 日，但為了文廟勘地事宜，又在臺北停留 4 天，到 14 日始返回新竹，於是擇定了 3 月 25 日（陰曆 3 月 2 日）開課。而 1926 年，因前一年家眷來臺寓居，過年無需返鄉探親，遂使得那年開學日提早到農曆年後的 3 月 7 日（陰曆 1 月 23 日）。相對而言，課程結束的時間，大致上也是配合其過年返鄉省親需求所做的安排，時間約在農曆臘月初旬到中旬之間。《客中日誌》記錄的兩次返鄉省親的停課時間，1924 年的停課日為 1 月 15 日（陰曆 12 月 10 日），而在 1 月 17 日啟程離開新竹；1925 年的停課日是 1 月 11 日（陰曆 12 月 17 日），而 15 日啟程赴臺北，準備返鄉。同樣地，在沒有返鄉探親的 1926 年初，其最後上課日則是落在 1 月 18 日（陰曆 12 月 5 日）的臘月上旬。在上述開學日的記載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1924 年開學日記錄了開課時舉辦的「釋奠禮」，所謂「釋奠禮」即是祭祀孔子，可見鄭家珍遵循了傳統書房的開學方式，透過此一祭祀儀式提醒學生對於師道之敬重。

至於，書房開課後的實際上課情況如何呢？根據日記裡的記載來看，書房開課的班級分為日學生、夜學生兩班，日學生上課時間分為上、下午兩個時段，夜學生則是在晚間上課。儘管，每日上、下午及晚間上課時間並未明確記載，⁷⁷ 但《客中日誌》中卻清楚記錄了各時段上課出席人數，⁷⁸ 以及例假日停課與教師因事休課的情況。若就學期中的上課時間來說，基本上比照當時一般學校的作息，從月曜日（星期一）起至土曜日（星期六）止，日曜日（星期日）依例停課。節假日部分則多半配合臺灣人的傳統習俗，包括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等均依例放假，⁷⁹ 官方祝日除每年元旦依例休假外，總督府規定的始政記念日僅配

⁷⁷ 有關日學生的上課時間，根據日本統治初期民政局學務課屬員木下邦昌於明治 29 年的調查：日課是從上午 8 點開始，至 12 時學生回家吃飯，而下午再從 1 時至下午 6 時結束。詳見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 439。至於，夜學部分則未見相關資料，唯《客中日誌》民國 14 年 5 月 4 日「附記」項下記載：「自本日起，夜間上課改作午後五時，以日晷漸長且免宴會缺課之抱歉。」依此估算，夜學上課時間約當兩小時，先前上課時間應為下午 6 至 8 時。又據此推斷，鄭家珍日學生應是在下午 5 時放學。

⁷⁸ 有關日記中記載各時段出席人數，始自第二本 1923 年 10 月 3 日至 1926 年 3 月 9 日，此前後雖有紀錄各時段「按時為諸生上課」事，但未言出席人數。

⁷⁹ 在傳統書房的休假日中，尚有上巳日部分，因該時間書房尚未開學，故未有停課之需求。另，孔子誕辰（農曆 8 月 27 日）在清代時本屬休假日之一，但因當時日本及中國均無此紀念日，故亦未停課。

合休假一次(1924年6月17日),可見鄭家珍書房的授課時間安排大抵是依循清代傳統書房的運作模式。此外,有關鄭家珍個人因事停課的情況也不在少數,唯日記中僅見二次利用假日補課的紀錄(1924年5月11日及12月28日)。究其停課原因,除了生病及出遠門外,白天多半是為人相墳、題主,晚上則往往是為了赴宴、看戲或詩會活動而停課。⁸⁰ 整體來說,有關上課時間的安排,明顯缺乏制度。

(二) 課程安排及其教學情形

除了上課時間的安排外,有關鄭家珍書房的課程安排及教學情形如何呢?日記中並無完整之陳述,僅零星見錄於1924年及1925年的幾則片段式記載:

1. 民國13年1月11日(陰曆12月6日)

晚間夜讀生《中庸》已解完,計自五月開校,一部《四書》至此已卒業矣。

2. 民國13年4月24日(陰曆3月21日)

本早辰刻,安至聖先師位,釋奠,開學。……。晚間為諸生授課《詩經》、古文、唐詩。

3. 民國13年5月12日(陰曆4月9日)

晴。照常上課。午後渡邊來視察,適余為蘇生木榮講《詩經》、《四書》,渠坐觀二刻許,始辭去。

4. 民國14年3月25日(陰曆3月2日)

(功課)上下午為日學生講古文、唐詩及《尺牘》。晚間,為夜學生講《易·豫卦》及古詩。

5. 民國14年3月26日(陰曆3月3日)

⁸⁰ 有關夜學因赴宴而停課情形不少,也因此於民國14年5月4日的日記中有一則附記:「自本日起,夜間上課改作午後五時,以日晷漸長且免宴會缺課之抱歉。」

（功課）為日學生講古文、《詩經》、《史約》、唐詩、《尺牘》。

6. 民國 14 年 4 月 1 日（陰曆 3 月 9 日）

（功課）上下午為日學生上課，講《四書》、古文、《史約》、《詩經》、《尺牘》及唐詩。夜間為夜學講《周易》、古詩。

7. 民國 14 年 4 月 2 日（陰曆 3 月 10 日）

（功課）午前上課者，男女學生計十一人。午後上課者，男女學生計〇〇〇。夜間上課者男學生，講《易》及古、唐詩。

依上述日記可見，日學生與夜學生的課程安排略有差異。其中日學部分，除 1923 年未有紀錄外，1924 年的課程有《詩經》、《四書》，1925 年則有《詩經》、《四書》、古文、唐詩、《史約》及《尺牘》的安排。夜學部分，1923 年一學年中上完了《中庸》一書，而 1924 年的課程有《詩經》、古文、唐詩；1925 年則有《易》、古詩及唐詩。綜合來看，書房課程的安排包括了經學、文學和史學三方面，同時也教授與生活應用相關的「尺牘」。其中《四書》、《詩經》與唐詩教學是日、夜學生的共同必修課程。而不同的是，夜學生在經學方面特別安排了《周易》，又詩歌方面，夜學生也比日學生多上了「古詩」課程。就課程的深淺來說，顯然日夜是有差別的，這多少也反應了學生程度之不同。同時，在這些紀錄中，吾人亦可以發現鄭家珍的教學方式，除了集體講授外，也視需求提供個別指導，如前列第 3 條中所記渡邊視察時，他正好在為蘇木榮講《詩經》、《四書》。

以上有關鄭家珍書房的部分課程安排，基本上所呈顯的是臺灣早期傳統書房的課程樣態。吾人可以對照 1896 年（明治 29 年）總督府民政局學務課屬員木下邦昌有關「教學科目課程」的視察報告：

大學之課程以歷史、文章、詩絕為主，中學之課程以書註作對為主，初學則以白文背誦及寫字為主。算術之學是商人行業，在學校絕對不會教。於兒童入門之初，先教以三字經。取其字句簡短，適合初學者誦讀之故。其次教以四書白文及幼學群芳之類，進而讀五經，更進者及於四書全註，再

進者則教以古文詩賦之類。其間兼課以習字及作對，作對熟習後便課以作文、作詩。⁸¹

報告中陳述的日本統治初年所見的狀況，應該也就是清代時期書房的課程樣貌。其中同樣包含了經學、史學與文學，有《四書》、《五經》，也有古文詩賦，與鄭家珍的課程安排大致相符。除了課程講授外，在該視察報告中木下邦昌也提到了相關的教學細節：「其間兼課以習字及作對，作對熟習後便課以作文、作詩」，尤其在教學法上，更有實際授課方式的解說：

教授詩文時，先讓各學生備一簿冊，於入學之際由教師寫上天地等文字發還之，但僅止於教授其讀法及意義，欲更進一步，則由教師於簿中一紙的右邊寫上一詞或一句發還之，學生思索其相對之詞或句子並書之於左側。其字數從一字對、二字對開始，漸次增加字數，有達於十二字對者，針對各字令其知曉其平仄。如此經過數年，以之做為作文、作詩之基礎，然後開始進入詩文的初步，漸漸及於令其書寫整篇詩文。⁸²

儘管對於教學的細節與方法，鄭家珍《客中日誌》未有明確記載，不過就其門弟子鄭却女史保留的上課作業練習本，可間接看到鄭家珍在書房教學的具體樣貌。

其中有關「作對」的教學內容，鄭却女史留存了兩本題為「風雅入門」(圖二)的筆記本，總共收錄了166組對句，其內容略舉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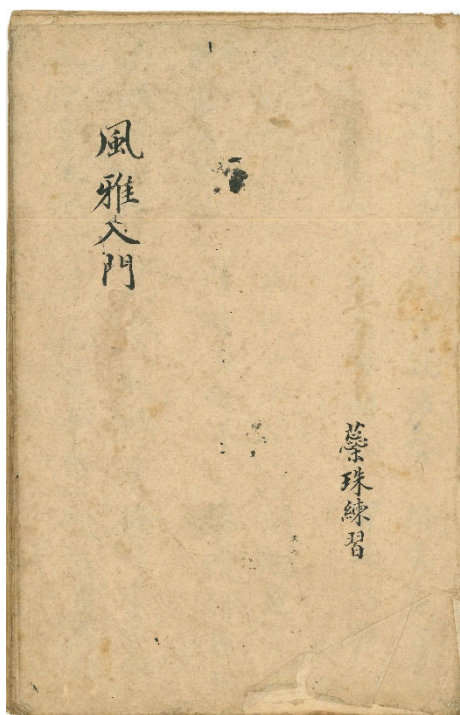
消愁須借酒，解悶要觀花。觀書能益智，讀易可明心。雨後山添翠，晴時海映蒼。鳥聲頻喚夢，月色易牽愁。撥雲尋古道，冒雨訪詩人。開窗延月入，捲幔待風來。⁸³ (圖三)

以上對句在筆記本上書寫的樣貌即為「消愁須借酒」上句在右，「解悶要觀花」下句在左，上句為鄭家珍出題，下句則由鄭却作對。像這樣的作業簿，想必當年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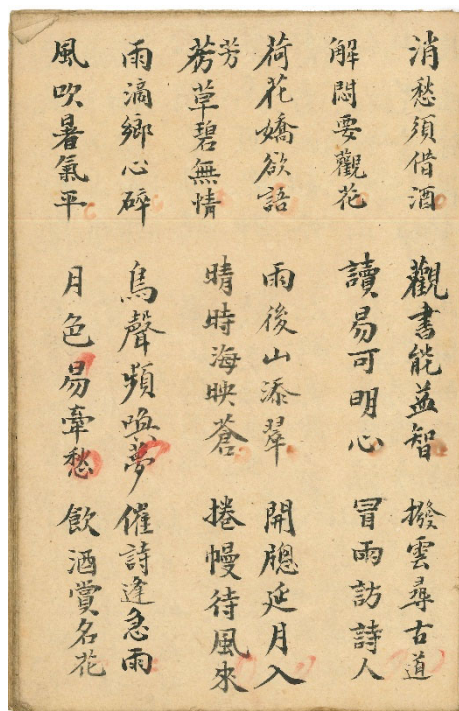
⁸¹ 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439。又，〈領臺當初の書房狀況〉，收於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1939)，頁966。

⁸² 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頁439；〈領臺當初の書房狀況〉，頁966。

⁸³ 作品見鄭蕙珠著、施懿琳編校，《鄭蕙珠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7)，頁272-277。〔按：以下圖片不另列出版項及引用頁碼〕。



圖二 鄭却《風雅入門》封面書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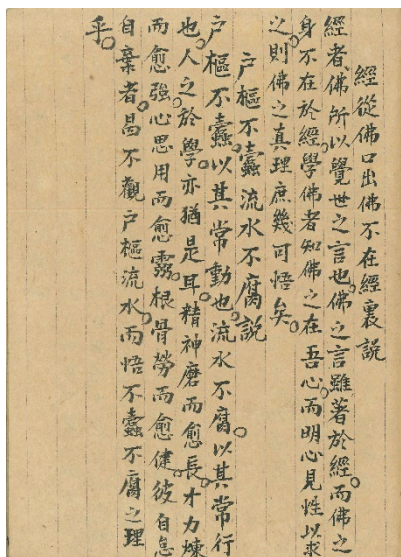
圖三 鄭却《風雅入門》內頁書影

房學生應該都擁有相同的本子。而由「作對」到「做詩」，鄭却女史同樣保留了完整的「詩練習簿」，記錄當年鄭家珍教學過程中所出的作業題，如「賦得滿階梧葉月明中得中字」、「賦得三星在罌」、「九日登高」、「插菊」、「人淡如菊」、「賦得十月先開嶺上梅」、「賦得霜落悴百草」、「懷人」、「守梅鶴」、「賦得寒戀重衾覺夢多」……等，⁸⁴ 詩題中擁有相當多的試帖詩題。另外，日記中也可以看到兩則為生徒改詩及課堂出題的紀錄，其一 1924 年 10 月 4 日「為生徒改〈砧聲〉詩」，其二同年 11 月 4 日：「(功課) 午前缺課。午後上課一人。夜間上課五人。留曉鐘限庚韻詩題。」⁸⁵ 簡單的兩條紀錄，約略可想見鄭家珍為學生批改詩作及命題寫作的情景。

至於，課程中有關「作文」教學部分，《客中日誌》載有：「為榮珠改〈戶樞不蠹流水不腐說〉」之紀錄，而鄭却女史留存的「詩文練習簿」中亦有收錄此文：

⁸⁴ 作品見鄭榮珠著、施懿琳編校，《鄭榮珠詩文集》，頁 45-47。

⁸⁵ 以上引文，詳見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 126、142。



圖四 「詩文練習簿」內文書影

戶樞不蠹，以其常動也；流水不腐，以其常行也。人之於學，亦猶是耳。精神磨而愈長，才力煉而愈強，心思用而愈靈，根骨勞而愈健。彼自怠自棄者，曷不觀戶樞流水，而悟不蠹不腐之理乎？⁸⁶（圖四）

文章原稿抄錄工整，當是鄭家珍已修改後所抄錄的版本。而另一本「詩文練習簿-未定草」中另抄有〈流水不腐論〉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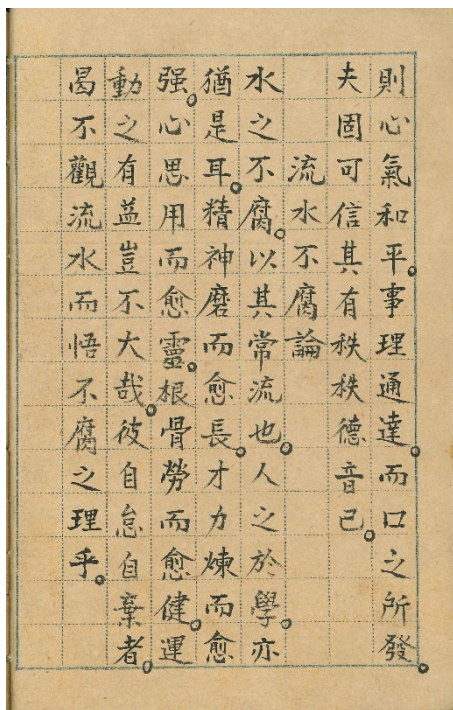
水之不腐，以其常流也；人之於學，亦猶是耳。精神磨而愈長，才力煉而愈強，心思用而愈靈，根骨勞而愈健，運動之有益豈不大哉？彼自怠自棄者，曷不觀流水而悟不腐之理乎？⁸⁷（圖五）

題目雖僅擇取後半，但文字幾乎雷同，二者差異處，或可作為修訂前後之差異對照。

從「作對」、「作詩」到「作文」，鄭家珍的教學及其命題形式，基本上比照傳統書房的教學模式，尤其試帖詩的命題，全然承襲傳統科舉考試的範式。但對於鄭家珍舉人言，傳統課程的教授外，他是否能如同前述在泉州教學一樣將新學（天

⁸⁶ 作品見鄭藁珠著、施懿琳編校，《鄭藁珠詩文集》，頁139。

⁸⁷ 作品見鄭藁珠著、施懿琳編校，《鄭藁珠詩文集》，頁139。



圖五 「詩文練習簿-未定草」內文書影

文曆算)帶進新竹作為書房教學的課程內容呢?首先,在1924年4月3日《客中日誌》中有以下的記載:

在家無事,檢點東行攜帶之書籍,計《綱鑑補註》一部共訂十二本、《御纂周易折中》二本、《書經傳說》二本、《詩經傳說》三本、《有正味齋駢體文》四本、《恆星經緯度》四本、《蓋氏對數表》一本、《尚友錄》四本、《五緯捷算》二本、《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一本,畫圖機器一匣,為本年教誨生徒之用。⁸⁸

敘述中,鄭家珍於南安收拾準備帶回臺灣的教學用書時,其中攜帶了《恆星經緯度》、《蓋氏對數表》、《五緯捷算》、《月五星相距恆星經緯度表》等天文曆算的相關書籍,以及「畫圖機器」,並表示將作為「本年教誨生徒之用」,可見鄭家珍有意在今年課程中加入天文曆算的教學;而返臺後的4月21日日記中又再次提及:

⁸⁸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75。

「下午命兒輩購畫圖機器，為教授生徒習天算之用。」顯然授課的準備相當周全，至於實際的教學情況究竟如何呢？

吾人在日記中看到的第一次教學紀錄是在4月28日：

晚間，學生有往聽戲者，出席減半。八點有奇，藥珠來問天文，爰指北斗及帝星，勾陳北極星與廿八宿中之軫、角、亢、氐、房諸星告之，仰觀之頃，頗能領略。⁸⁹

這一次的天文觀察，主要是順著學生鄭藥珠提問而產生的。而第二天4月29日，鄭家珍接著「夜率兒輩觀井、鬼、柳、星、張、翼、軫七星」，5月1日則是「夜藥珠邀同觀星，因微雲不能多見，僅就所見者，略為指示一二」，到了5月7日更再一次「率兒女輩於塾之前後觀之，指點庫樓十星，四衡十一枵。」⁹⁰ 初期有關天文觀測的教學，大抵是以兒女輩為主，而其中鄭却女史更表現出積極的興趣，這似乎與原初打算「教誨生徒」的用意有一定落差。

在經過一個月的天文觀測後，6月27日鄭家珍的教學進度來到了曆算幾何階段。《客中日誌》記載言：

藥珠手製測星儀器，為教以測高測遠之法。設有一物不知其高與遠，先用儀器測之得三十一度，其餘弦為8572，正弦為5150，再將儀器退九尺測之得一十五度，其餘弦為9659，乃以兩餘弦相減，餘1087為一率。前後表距九尺為二率。三十一度之正弦為三率，求得四率為四尺二寸六分，加四表高得所求。⁹¹

由於觀測所需，鄭却自製了觀星儀器，鄭家珍此時遂進一步教導其三角函數應用來測量高度，而此後有關曆算方面的教學，便集中在鄭却一人身上，如10月5日「藥珠來學五星推步法」、10月6日「誨藥珠真數和假數法」、10月28日「檢察藥珠所算木星行度稿」。⁹² 經過持續一年的教學後，1925年4月28日日記中有

⁸⁹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83。

⁹⁰ 以上引文，詳見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84-86。

⁹¹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98。

⁹²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126、127、139。

如下記載：「教藥珠『日躔借角求角法』，頗能領悟，余甚喜絕學之有傳人也。」⁹³ 尤其是同年 5 月 17 日的日記更言：

藥珠來問月離一二平均緣由，為解《後編·圖說》以示之，且命之求立方，較與表恰合。余甚嘉其明慧，作詩三首贈之，有「海東從此添佳話，傳附疇人有女真」之句。⁹⁴

從上述「余甚喜絕學之有傳人也」及「余甚嘉其明慧，作詩三首贈之」所表述的喜悅心情，可知在天文曆算學習需有較高領悟力，以致十人不得其一的情形下，鄭家珍有機會在新竹將此絕學傳承下去，內心似乎頗感安慰。故而，原先有意做為教授生徒的課程規劃，最終也只得鄭却女史唯一傳人。

綜上所述，有關鄭家珍的實際教學情形，大體保留傳統書房的課程規畫及教學模式，儘管他曾以「新學」聞名，早年於泉州文廟設帳時，便以講求新學為主。而在回臺開設書房時，雖也曾規劃以天文曆算教授生徒，但卻受限於學生興趣及資質因素而未能普及於課堂教學，僅能成為個別私授課程。

（三）書房與詩社活動

在上述一般的課程教學外，鄭家珍也藉由課外的詩社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將所學具體實踐於類科舉形式的競技活動中。鄭家珍於 1919 至 1927 年間在臺設帳，這期間剛好是臺灣詩社蓬勃發展的黃金時期。他不僅個人積極參與各地詩社活動，同時也在書房課程中安排詩歌教學，如前所言「作對」、「作詩」等教學課程，甚而輔導學生成立「耕心吟社」。此詩社源自於吳景祺家設帳時所設書齋名稱，日記中也記錄了不少有關耕心吟社活動的情景。

首先，有關「耕心書齋」名稱是出現在 1924 年 1 月 3 日日記中：「下午同諸生在耕心書齋照像，又與藥珠同照以為後日紀念。」這張照片目前仍保存於紫霞堂中，照片裡鄭家珍與鄭却合照之身後背景有一「耕心齋」題匾，立匾時間題署為「癸亥仲冬」，相當於 1923 年 12 月（陰曆 11 月），可知書齋名稱是在此

⁹³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 231。

⁹⁴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 240-241。又，所謂「作詩三首贈之」，詳見同日日記「著述」下之記載。同詩作，《雪蕉山館詩文集》題作〈藥珠近學天算頗有心得書以勵之〉。

前所命名。

既然「耕心吟社」的名稱是源自於「耕心齋」，那「耕心吟社」究竟底成立於何時？目前未見明確的說法。不過，在1924至1925年間《客中日誌》中，可見之相關活動紀錄有7則，其中1924年6月8日第一次的記載最為詳細：

本日耕心吟社開會，第一唱詩題係〈種竹〉，東韻，吳芝村得元；二唱〈花影〉，冬韻，鄭邦熙得元。是日獎品為食木，吳社堂、黃植三等所寄付。午間，酒席亦社堂作東。曾吉甫先生亦來臨會，下午三時始星散。⁹⁵

這次活動中，得元者為吳芝村，獎品捐贈者為吳社堂（吳景祺）、黃植三（黃瀛槐），詩社活動後的酒席則由吳社堂包辦，上述三位均為鄭家珍書房學生。若再根據魏經魁抄錄的〈耕心吟集〉來看，⁹⁶〈種竹〉詩題下入選之作品計有杏農（吳芝村）、省三（陳章傳）、季雍（鄭邦熙）、節侯、植三（黃瀛槐）、伯梧（魏經魁）、堃南、傑臣、社堂（吳景祺）、牽（孫牽）等10位作者之17首作品，目前可考者七人，均為鄭家珍書房之學生。

而其餘6則中，記錄了4次詩會活動事宜，活動的舉辦均是利用假日期間。⁹⁷至於，鄭家珍在詩社中所扮演的角色，則是擔任詞宗命題，或是協助改詩。

此外，若以〈耕心吟集〉中之作者來看，扣除一人多個名號者後，總計作者有41人，可考者22位，有11位可確認為書房學生，⁹⁸其餘則包括在地友社社員，如景雲（謝景雲）、郁仙（鄭炳煌）、竹峯（陳竹峯）、香圃（鄭香圃）、水柳（謝水柳）、森鴻（謝森鴻）等，藉由這樣的詩社活動，不僅有利於學生們的詩藝精進，也讓年輕學子獲得與他社詩人切磋交流的機會。因此，在日記中吾

⁹⁵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客中日誌》，頁93。

⁹⁶ 魏經魁編，〈耕心吟集〉（1974年手抄本）。

⁹⁷ 其中1924年6月17日為「始政日」之休假日，而1924年7月13日、7月20日、1925年7月12日均為日曜日。同樣地，前述1924年6月8日亦為日曜日。

⁹⁸ 相關名單如下：杏農（吳芝村）、省三（陳章傳）、季雍（鄭邦熙）、節侯、植三（黃瀛槐）、伯梧（魏經魁）、占梅）、堃南、傑臣、社堂（吳景祺）、牽（孫牽）、榮慰（鄭榮慰）、奇烈（黃其烈）、魁俊（漢德、鄭魁俊）、聯璧、呈奇（李呈奇）、鈇縱（陳鈇縱）、橫舟、子擎（王子擎）、景雲（謝景雲）、郁仙（鄭炳煌）、竹峯（陳竹峯）、步雲、問渠、陋齋、香圃（鄭香圃）、瘦菊生、水柳（謝水柳）、劍雄、森鴻（啟書，謝森鴻）、炯軒（許光輝）、碧映、士錦、璧秧（碧秧）、叔潛（魏經龍）、雲山、藥珠（鄭藥珠）、泛舟、簧舟、斯得、雪庵、完真。

人可以具體掌握攸關耕心吟社的活動與創作情形，同時還可明瞭書房教育與詩社間的密切關連性，值得未來再詳加考掘。

六、結論

關於日治時期臺灣書房教育，相關研究者均指出，從 1898 年日本殖民政府頒布「臺灣公學校令」和「關於書房義塾規程」之後，書房被迫納入政府管理，而到了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私立學校規則」出現後，更是雪上加霜，在同化政策的強力主導下，導致書房數量銳減、公學校漢文課改為隨意科。而就在內臺共學政策實施的壓力，以及漢文即將衰頹的危機感下，臺人強烈感受到維繫漢文於一線之必要，因此詩社的蓬勃發展與以漢文研究會、詩學研究會名義成立的漢文學習場所，變成一種風潮。本文藉由舉人鄭家珍及其在臺的《客中日誌》相關紀錄，看到了更為複雜的現象，箇中情景足以提供吾人對於當年書房教育樣貌，取得更加細微的發現與認知。

那麼，鄭家珍的書房教育運作情景，具有何種特點？首先，從鄭家珍在新竹教學的歷程來看，回竹任教時間是在 1919 年初，直到 1927 年底止，他憑藉著擔任地方大家族家庭教師身分，同時吸引家族周邊學生前來就讀，學生中除了無從查考的 12 位外，有 31 位均是公學校畢業生，甚至有 5 位公學校教師（2 位現職），另外有為數不少任職於公私機關者，由於學生身分不同於一般書房義塾係以學齡兒童為主，故在公學校廣增的時代裡，其書房依然得以持續運作。從某個角度來看，這書房既然在總督府的規範下，以「夜學會」、「漢學研究會」或「漢學講習會」名義提出設置申請，基本上可視為一種進修教育，屬於學校漢文教育的補充性學習場所，除了招收已進入職場的公學校畢業生外，更吸引公學校教師來入學。

再者，伴隨著總督府針對書房的廢弛政策，相對地在大正、昭和年間卻激發起臺人熱衷參與詩社活動並創建詩社的熱潮，其中有不少是跟書房結合的青年詩社，鄭家珍輔導書房學生設立的耕心吟社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以新竹而言，尚有葉文樞的讀我書社、張純甫的柏社，這都可以作為一個鮮明的個案探討，日

後可再進行比較研究。

簡言之，本文就鄭家珍《客中日誌》中有關其人書房教學過程的詳實紀錄，據以進行研究，一方面將書房相關問題面向逐一探討，另一方面則試圖與總督府推動的新式教育政策相勾連，藉由如此具體的分析與討論，既能獲見鄭氏書房運作概況、日治新竹書房教育一隅，同時也能更加體會在日本新式教育興起之際，臺灣傳統書房教育的存在樣貌，以及維繫漢文於一線的傳承意義。

附錄 歷年書房學生背景分析表

姓名 (生卒年)	就讀年度	繳交 束金	出身及履歷	學歷
吳景祺 (1900-?)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80元 60元	號祉堂，新竹北門外水田郊商吳振利家人，吳謙光次子。1919年參與創立樹林頭信用組合，擔任組合員。就讀書房時，任職樹林頭信用組合組合員。	1917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吳俊楷 (1900?-?)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40元 60元 60元	1942年擔任食糧局新竹食糧事務所雇員。	1914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吳汝權 (1912-1960)	癸亥年(1923)	30元	生平不詳。	1926年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
吳添旺 (?-?)	癸亥年(1923)	20元	生平不詳。	
高啟明 (1913?-?)	癸亥年(1923)	20元	生平不詳。	1927年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
許光輝 (1903?-?)	癸亥年(1923) 乙丑年(1925)	40元 50元	字炯軒。1931年(昭和6年)與謝森鴻、郭仙舟、謝景雲、陳竹峰、王小躡、鄭炳煌等，於新竹成立竹林吟社。後亦為竹社成員。	1917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邱再傳 (1900?-?)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30元 40元	1917年任新竹樹林頭公學校(第二公學校)訓導，任職至1940年。就讀書房時，任職新竹第二公學校訓導。	1914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1917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
鄭邦圻 (1907-?)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50元 60元 50元	北門鄭家第8世，鄭用鑑派下。鄭安鏘四男，鄭安鈞(鄭德均五男)嗣男。	1922年新竹第一公學校畢業。
鄭金水 (1894-?)	癸亥年(1923)	32元	東門外人。1914-1915年任職新竹公學校訓導。1916-1918年調任新竹女子公學校。1925年起歷任新竹第一公學校、住吉公學校、石光公學校坪林分教場、紅毛公學校、鹽水公學校、北門國民學校、新富國民學校，至1944年止。就讀書房時，無相關任職紀錄。	1910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1914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 1925年臺北師範學校公學校乙種本科正教員養成講習科結業。
鄭藥珠 (1910-1997)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30元 40元 40元	二十張犁人，本姓林，出生後過繼水田鄭程材貢生後人鄭江泉、鄭葉氏遂為養女。原名鄭却，藥珠為其道號。就讀公學校期間，課餘先後追隨鄭彥舍、李錫如、鄭虛一學習漢文。1923年公學校畢業後，跟隨鄭家珍專研漢學、天文、曆算等。1939年承繼紫霞堂。	1923年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

姓名 (生卒年)	就讀年度	繳交 束金	出身及履歷	學歷
蘇其民 (1905?-?)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20元 40元 40元	生平不詳。	1919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蘇木榮 (1908-1992)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20元 30元 30元	北門人。戰後曾任北門里里長。	1922年新竹第一公學校畢業。
鄭建樑 (?-?)	癸亥年(1923) 乙丑年(1925)	30元 20元	北門鄭家第9世。	
鄭建長 (1904-1959)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20元 40元	北門鄭家第9世，鄭用鑑派下。邦權(1881-?)次男。1921年起任新竹州知事官房會計課雇員，1930年升任吏員／書記，1940年改任新竹州內務部勸業課，1941年後任新竹州總務部會計課、產業部商工水產課。1946年代理新竹縣政府財政科會計股長。1947年起任職於華南銀行，擔任新竹分行襄理兼出納股長，1949年昇任竹東分行經理，1958年調任新竹分行經理。就讀書房時，任職新竹州知事官房會計課雇員。	1917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畢業。
李增欽 (1903?-?)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30元 40元	生平不詳。	1917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黃其烈 (1903?-?)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30元 40元 40元	生平不詳。	1917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鄭邦熙 (1898-?)	癸亥年(1923)	20元	北門鄭家第8世，鄭用鑑派下。鄭安泰(1875-1899)長男，祖父鄭養齋。	1915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魏經魁 (1904?-?)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20元 30元	臺灣商工銀行(第一商業銀行前身)新竹支店員。	1918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吳芝村 (1903?-?)	癸亥年(1923)	20元	生平不詳。	1917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陳章傳 (1903-?)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30元 40元	字省三。1925年任職臺灣商工銀行新竹支店員。1926年調苗栗出張所。1955年時任第一商業銀行潮州分行經理。	1918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私立臺灣商工學校畢業。
張藩鎮 (?-?)	癸亥年(1923) 甲子年(1924)	20元 30元	1932年擔任北門蔗作研究會書記。	

姓名 (生卒年)	就讀年度	繳交 束金	出身及履歷	學歷
蘇惟梁 (1896-1967)	癸亥年 (1923)	20/3 元	<p>崙仔庄人，蘇守鈿(1876-1947)長子。</p> <p>1917 年任職花蓮港廳花蓮港廳太巴塢蕃人公學校訓導。</p> <p>1918 年擔任新竹樹林頭公學校訓導。</p> <p>1920 年 9 月改任同校教諭，後辭職。</p> <p>1923 年 11 月前往東京，先就讀青山學院，後改入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p> <p>留日期間加入新民會，1925 年休假返臺，與堂弟惟焜加入臺灣文化協會。</p> <p>畢業回臺後，初期經商不順，1935 年當選第一回新竹市會議員，因故被判當選無效。</p> <p>1945 年，與林獻堂等五人為臺灣代表，赴南京參加中國戰區日本投降典禮，惜因日本臺灣軍區參謀長諫山春樹之阻止而未參與。此後活躍於政界，先後當選新竹市參議會第一屆議員、第一屆臺灣省參議員。二二八事件時任臺北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常務委員。</p> <p>就讀書房年度，已辭教職，準備赴東京進修。</p>	<p>1913 年新竹公學校畢業</p> <p>1917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p> <p>1927 年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p>
蘇惟焜 (1897-1945)	癸亥年 (1923)	20/3 元	<p>崙仔庄人，蘇根臣(1892-1917)長子，蘇惟梁堂弟。</p> <p>1917 年新竹公學校訓導。後與堂兄惟梁同赴日本留學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返臺後任職臺灣新民報記者，後任新民報高雄支局長、新竹支局長。</p> <p>1935-1937 年任職新竹市役所財務課雇員。</p> <p>就讀書房時，已辭教職，準備赴東京進修。</p>	<p>1916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師範部乙科畢業。</p> <p>日本中央大學法學部畢業。</p>
蘇惟杰 (1898-1976)	癸亥年 (1923)	20/3 元	<p>崙仔庄人，蘇守鈿次子。</p> <p>醫學校畢業後，任職於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後主持板橋仁壽醫院，並擔任海山郡公醫。</p> <p>就讀書房時，任職於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p>	<p>1914 年公學校畢業。</p> <p>1919 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p>
鄭應鰲 (1900-?)	癸亥年 (1923)	60 元	<p>北門鄭家第 8 世，鄭用鑑派下。鄭安書三男，鄭安炳嗣男。原名應鰲，後改名邦鰲，字曉六。</p>	<p>1915 年新竹公學校畢業。</p>

姓名 (生卒年)	就讀年度	繳交 束金	出身及履歷	學歷
李呈奇 (1901-?)	癸亥年(1923)	6元	表町(北門街)李清秋四男。 1937年,總督府官房外事課派任至荷屬印度地方任衛生狀況調查囑託。戰後出任北門街世慶醫院院長(1919年李世慶開設)。 就讀書房時,為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生,準備赴日留學。	1914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1922年臺灣總督府醫學校畢業。 1926年山口高等學校畢業。 1930年九州帝國大學醫學部畢業。 1936年爪哇巴達維亞醫大畢業。
吳廷生 (1904?-?)	癸亥年(1923)	6元	生平不詳。	1918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黃瀛槐 (1899?-?)	甲子年(1924)	40元	字植三。1913年任苑里公學校山腳分校雇員。1915年調任新竹廳樹林頭公學校雇員至1917年止。後任職臺灣商工銀行新竹支店員,曾調派苗栗出張所。 就讀書房時,任臺灣商工銀行新竹支店員。	1913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孫牽 (1900?-?)	甲子年(1924)	32元	1919年任職樹林頭公學校蕨園分校訓導,1921年大湖公學校八角林分校教諭,1924年新竹州內務部地方課雇員,至1934年止。後於北門經營德盛商行。 就讀書房時,任新竹州內務部地方課雇員。	1914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吳朝璇 (1910?-?)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20元 30元	吳朝綸之弟。 就讀書房時,公學校剛畢業。	1924年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
陳鎮圭 (?-?)	甲子年(1924)	20元	1931年任職新竹市役所財務課雇員。	本年9月1日入學。
吳冰銜 (1906?-?)	甲子年(1924)	30元	1929-1930年任職鐵道部運輸課雇員。	1920年樹林頭公學校畢業。
黃賜得 (1906?-?)	甲子年(1924) 乙丑年(1925)	24元 30元	生平不詳。	1920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吳芝川 (?-?)	甲子年(1924)	30元	生平不詳。	
彭炳輝 (?-?)	甲子年(1924)	20元	生平不詳。	
吳榮輝 (?-?)	甲子年(1924)	16元	生平不詳。	吳旭之子?
陳金木 (1903-?)	甲子年(1924)	12元	字鉄鏝。	入學時21歲。

姓名 (生卒年)	就讀年度	繳交 束金	出身及履歷	學歷
陸鍾傳 (?-?)	乙丑年(1925)	40 元	生平不詳。	
黃上林 (?-?)	乙丑年(1925)	30 元	生平不詳。	
陳嘉志 (?-?)	乙丑年(1925)	10 元	生平不詳。	
鄭邦清 (?-?)	乙丑年(1925)	8 元	生平不詳。	
溫吉 (1903-?)	乙丑年(1925)	12 元	溪埔人。1923 年任職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1934 年改任大溪公學校訓導，1938 年任桃園第一公學校訓導，1940 年為臺北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公學校訓導。就讀書房時，任新竹第一公學校訓導。	1919 年新竹公學校畢業。 1923 年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本部畢業。
鄭邦讓 (1895-?)	乙丑年(1925)	30 元	北門鄭家第 8 世，鄭崇和派下。鄭榜南(1871-1901)長子，嗣父鄭安斌(1863-1891)三男。曾祖父鄭理亭(1785-1843)、祖父鄭如金(1840-1874)。	

說明：

1. 凡生年之後標示有「？」者，代表該年份屬於推估。推估依據為公學校畢業年份，並以就學齡 8 歲加 6 計算。

2. 頁 85 蘇氏三人以蘇惟梁代表繳交束金，因此金額要除以 3。相關敘述參見內文，頁 59-60。

資料來源：《新竹公學校畢業生名冊》；《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生名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鄭邦琛修補，〈浯江鄭氏家乘〉(1980 年寫本)；〈祭祀公業鄭恒升派下人系統表〉；〈鄭建長相關履歷文書〉(鄭晒輝先生提供)；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檔案》，下載日期：2019 年 6 月 30 日，網址：<http://ds3.th.gov.tw/ds3/app000/>；張永堂總編纂，《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黃旺成先生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19 年 8 月 7 日，網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下載日期：2019 年 8 月 5 日，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國家檔案資訊網」，下載日期：2019 年 9 月 4 日，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引用書目

- 〈祭祀公業鄭恒升派下人系統表〉
〈鄭建長相關履歷文書〉(鄭炳輝先生提供)。
《新竹公學校畢業生名冊》
《新竹第二公學校畢業生名冊》
《新竹廳報》
《福建省南安縣溪美鎮崎峰村鄭氏家譜》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總督府府報》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王郭章訪問,〈鄭却訪問錄音〉(1991年6月30日,新竹:新竹市文化局提供)。
黃美娥訪問、記錄,〈鄭却訪談紀錄〉(1996年2月24日於新竹市寶山路紫霞堂)。
鄭邦琛修補,〈浯江鄭氏家乘〉(1980年寫本)。
魏經魁編,〈耕心吟集〉(1974年手抄本)。
《黃旺成先生日記》,「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下載日期:2019年8月7日,網址:
<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臺灣總督府檔案》,下載日期:2019年6月30日,網址:<http://ds3.th.gov.tw/ds3/app000/>。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下載日期:2019年8月5日,網址:<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
「國家檔案資訊網」,下載日期:2019年9月4日,網址:<https://aa.archives.gov.tw/index.aspx>。
王 松(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59 《臺陽詩話·上卷》,臺灣文獻叢刊地34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何佳韻
2010 〈日治時期臺灣北部地方米價的新探索:《新屋鄉葉氏嘗簿》的解讀與分析〉。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吳文星
1978 〈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思與言》(臺北)16(3): 62-89。
李輝良
2001 〈臺灣舉人·南安辦學〉,收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南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南安文史資料:第23輯》,頁127-131。南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福建省南安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武麗芳
2010 《日治時期塹城詩社淺探:耕心吟社、讀我書吟社、柏社》。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鄭藥珠(著)、施懿琳(編校)
2017 《鄭藥珠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張永堂(總編纂)
1997 《新竹市志·卷七:人物志》。新竹:新竹市政府。

許佩賢

2005 《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財團法人曹永和文教基金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旺成（主修）

1976 《臺灣省新竹縣志·卷七：教育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1976 《臺灣省新竹縣志·卷末：志餘》。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黃旺成（纂）

1955 《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七：教育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1955 《臺灣省新竹縣志稿·卷九：人物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

黃美娥

1999 〈清代臺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詹雅能

2017 〈從新竹到南安：以新史料重探舉人鄭家珍生平事蹟〉，收於陳惠齡主編，《自然、人文與科技的共構交響：第二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7-113。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臺南市役所（編）

1922-1925 《臺南市統計書》。臺南：臺南市役所。

臺灣教育會（編）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臺灣教育會（著）、許錫慶（譯注）

2010 《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譯本）》。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臺灣新民報社（編）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編）

1918-1924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總督府。

1940 《臺灣事情》。臺北：臺灣總督府。

新竹州（編）

1923 《新竹州第三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1924 《新竹州第四統計書》。新竹：新竹州。

鄭家珍（著）、詹雅能（編校）

2016 《雪蕉山館詩文集》。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2016 《客中日誌》。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2016 《客中日誌：手稿影存 I》。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2016 《客中日誌：手稿影存 II》。新竹：新竹市文化局。

Traditional Private Study Education in Taiwan of 1920s: Zheng Jiazhen's *Diary of a Guest* as Observation Focus

Yea-neng Chan

ABSTRACT

After Japanese invasion of Taiwan in 1895, Zheng Jiazhen, a *juren* (first-degree/provincial certified scholar) born in Hsinchu, Taiwan, migrated back to his ancestral hometown, Nan'an, Fujian, and made his living as a teacher. In 1913, as a well-known *feng shui* (Chinese geomancy) master, Jiazhen was invited to Taiwan to find a good burial place for a local gentry, Zheng Rulan. In 1919, Zheng Rulan's descendants employed Jiazhen as their family teacher. During his eight-year stay as a teacher of this renowned Zheng family of North Gate of Hsinchu, Jiazhen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language education in Hsinchu area. On one hand, Taiwan of the 1920s was undergoing educational reform with new laws and policies introduc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Public schools were increasing but with classes taught in Chinese language decreasing. Traditional private studies were under close scrutiny or even banned. All these posed threat to Chinese-language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Under this situation, what was the role played by teachers of traditional studies? How did traditional studies survive?

Diary of a Guest is Jiazhen's journal from 1923 to 1926, in which he wrote about history, literature, *feng shui*, and education. In particular, his records of teaching hours, number of students, timetable and curriculum, attendance, school fee, school applic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ols of traditional studies and poetry societies were precious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researching and reconstructing the operation of tradition private study education in Taiwan of 1920s. Jiazhen's diary also served as a good starting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school of traditional studies under the new colonial educational reform and Jiazhen's plan and vision for traditional Chinese-language studies.

Keywords: Zheng Jiazhen, *Diary of a Guest*, Traditional Private Study Education, Hsinchu, Poetry Society, Kangaku Short Course